

記憶或遺忘，抑或相忘於網路

——從歐洲法院被遺忘權判決，檢視資訊時代下的個人資料保護

張 志 偉*

要 目

- | | |
|---------------------------------------|------------------------------|
| 壹、問題意識：從移除職棒假球搜尋結果案說起 | 一、背景與待決爭議 |
| 一、職棒假球案 | 二、歐盟資料保護指令與基本權憲章的適用範圍 |
| 二、忘不掉的法拍 | (一)實體適用範圍——網頁搜尋與搜尋結果作為獨立資料處理 |
| 三、濫醉海盜教師 | (二)搜尋引擎業者作為資料保護法上的責任人 |
| 四、買春男改過自新 | (三)地域適用範圍 |
| 五、網路時代下資料保護法制的困境 | 三、特定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被遺忘權 |
| 貳、歐洲法院Google被遺忘權判決——關於個人資料保護與人格權的指標案例 | (一)搜尋結果與原始網頁的區分 |

DOI : 10.3966/102398202017030148001

*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對於匿名審查老師所提供建議，並指出若干思維及論證上缺失之處，筆者衷心感謝並虛心接受，並已於內文相關處予以修改與補充。此外，吳信華教授事先曾審閱本文初稿，並提出諸多指正與建議，筆者亦由衷感謝。惟不足之處及文責當由筆者自負。

投稿日期：一〇四年八月十七日；接受刊登日期：一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責任校對：林綠貞

(二)個人利益優先的衡量取向	肆、資料保護法的具體化
(三)不適用媒體特權	一、德國資料保護法第35條之適用
(四)小 結	二、執行層面
參、憲法基礎與衡量模式	三、借鏡歐洲法院與德國學理，評
一、被遺忘權的憲法基礎	釋我國法院被遺忘權裁判及個人
(一)我國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	資料保護法可能的繼受途徑
(二)德國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	(一)臺北地院暨臺灣高等法院被遺
二、個人資料與時間經過作為數位	忘權判決見解
人格權的要素	(二)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中之請求
三、人格權保障與資訊自由間之緊	權基礎探求
張關係	伍、結論與展望

摘 要

歐洲法院（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EuGH）在二〇一四年五月針對網路上的個人資料保護作成指標性判決，判定只要該當事人享有資料保護法上的刪除請求權，搜尋引擎業者Google即負有義務，將特定連結從其搜尋結果列上移除。文獻與媒體報導多簡稱為「被遺忘權」判決。本文旨在介紹並分析此一歐洲法院指標性裁判，並針對判決所肯認「特定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Anspruch auf Nichtanzeige bestimmter Suchergebnisse，下稱為「被遺忘權」）的論據加以探討。對此判決有基礎瞭解後，則試圖從我國憲法及德國基本法規範中探求該請求權的憲法基礎及其衡量因素；再者，本文亦探討如何將此一請求權具體落實於法律；最末則是評釋我國法院關於被遺忘權裁判，借鏡歐洲法院裁判的論理，探討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上可能的繼受途徑，以作為本文的結論與展望。

關鍵詞：歐洲法院、被遺忘權、人格權、資料保護

壹、問題意識：從移除職棒假球搜尋結果案說起

「網路不會忘記任何事」(Internet, das nichts vergisst)，這句話相信許多習慣利用網路搜尋資料的人都心有戚戚焉。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與搜尋引擎所聯繫的資料網絡，人們在享受科技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性之餘，卻也同時產生個人資料在網路上被揭露、蒐集或拼湊的危險。正如德國學者Wolfgang Hoffmann-Riem所言，資訊社會就是風險社會的一部分，只有在接受科技發展必然具有某程度的風險的前提下，才能利用科技所帶來的優點¹。然而，未解決的問題在於，可容許的風險界限何在？個人對於網路上的個人資料能有多少掌握可能性，是否只要一旦於網路上散布，藉由搜尋引擎所連結、擴散，就只能任由不實或私密的個人資料無限期地在網路上任人搜尋獲悉呢？如何因應網路時代下的個人資料保護，遂成為當代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不約而同的是，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針對搜尋引擎業者，要求其刪除特定相關搜尋結果所提起的訴訟，臺灣自然也不例外，臺北地院一〇三年度訴字第二九七六號裁判即屬此例。

一、職棒假球案

臺北地院一〇三年度訴字第二九七六號裁判的原因事實是前職棒米迪亞暴龍隊執行長原告施建新，認為九十七年間自由時報不實報導「買球隊打假球」。於Google搜尋引擎上以「施建新」為名搜尋，可以發現許多轉載該報導的網頁，使其名譽權及隱私權持續受損。因此，原告依侵權行為、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GOOGLE INTERNATIONAL

¹ Hoffmann-Riem, AöR 123 (1998), S. 513 (528).

LLC) 移除以「施建新」為關鍵字取得的網路搜尋結果及「www.google.com.tw」關於「施建新假球」之搜尋建議關鍵字。案件起訴之後，被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為「Google臺灣分公司」）抗辯Google搜尋引擎是由美國公司Google Inc.經營維護，Google臺灣分公司和Google Inc.是不同法人。原告隨即追加設於加州、未經我國認許的美國公司Google Inc.為共同被告，但一審法院並未准許，於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裁定駁回追加之訴（臺北地院一〇三年度訴字第2976號裁定），經原告抗告之後，高院於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廢棄地院裁定（高院一〇四年度抗字第491號裁定），原告追加Google Inc.為共同被告部分發回地院，但此一程序追加部分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一〇四年度上字第389號裁定駁回。於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臺北地院已認為Google搜尋引擎網站是由Google Inc.所經營，Google臺灣分公司並沒有負責搜尋業務，並不是原告所指侵權行為之主體，且消費者保護法所保護之法益不包含名譽權及隱私權，判決原告敗訴。惟原告對於Google臺灣分公司和Google Inc.之訴訟已於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一〇四年度上字第389號判決駁回²。高等法院認為在舉證上，上訴人無法證明本案中的被上訴人係執掌搜尋引擎業務、擁有管理搜尋引擎權限之企業；再者，法院認定「被遺忘權」並非我國現行法所承認之權利，上訴人無權主張要求Google臺灣分公司將系爭搜尋結果移除。此外，上訴人未因此生有實際損害，且報社之言論與搜尋引擎業者無關（詳細評論參見本文肆、三部分）。

除了臺灣案例外，其他國家亦有類似案例：

² 臺北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976號裁定暨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389號裁定暨判決之原因事實。

二、忘不掉的法拍

一名西班牙國民由於未繳納社會保險費用，而導致其房子遭強制拍賣的合法官方公告，自一九九八年起就一直儲存於西班牙報紙線上版。在輸入當事人姓名於搜尋引擎後，搜尋結果都是連結到該強制拍賣公告。他要求Google從搜尋結果中刪除其網頁連結，其理由乃是該抵押拍賣許多年前已了結，並且不需要再被提及。在歷經透過西班牙資料保護署（die spanische Datenschutzagentur, AEPD）對於Google總公司、西班牙分公司與日報的訴願後，而西班牙資料保護署支持當事人主張，要求Google採取必要措施，移除相關資料並禁止日後再蒐集該個人資料。因此Google即向西班牙法院起訴，該承審法院遂依Art. 267 AEUV程序中止，移送歐洲法院審理³。

三、濫醉海盜教師

美國一位單親媽媽Stacy Snyder在二〇〇六年結束了教師課程而想要成為老師。但系主任告知她無法成為老師，即便她通過所有考試與實習，甚至是優異成績。因為在網路上有張她濫醉且身著海盜帽的照片流傳，而被認定與教師形象不符，易誤導學生從事非法飲酒的行為。Stacy Snyder主張該照片應予刪除，且應該在網路中被遺忘⁴。

³ 此即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的事實。詳細事實經過可參見Luch/Schulz/Kuhlmann, EuR 2014, S. 698 (700).

⁴ Mayer-Schönberger, Delete – Die Tugend des Vergessens in digitalen Zeiten, 2. Aufl., 2010, S. 10f. 氏為奧地利學者，於奧地利完成法學教育，而後成為美國哈佛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教授。2009年出版的「刪除——數位時代下的遺忘美德」（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一書，當中所提出的「被遺忘權」觀點不僅廣受學術界引用與討論，更成為歐盟關於資料保護的官方政策。本文所引係2010年德文譯本。

四、買春男改過自新

而日本一名男子在搜尋引擎網站Google搜出過去曾被逮捕的報導。遂以人格權受侵犯為由，向法院提出要求Google刪除搜索結果。對此，埼玉地方法院裁判勒令Google刪除該男子的被捕報導⁵。

五、網路時代下資料保護法制的困境

前述四則案例不約而同都彰顯網路資訊時代中，蒐集、傳遞與利用個人資料所帶來對於個人人格、名譽權等危險⁶。從人類歷史觀之，因資料保存不易，遺忘對於人類而言是常態，記憶毋寧是例外。過去為了記憶必須將文字抄錄或印刷於竹簡、紙張等載具；然而數位科技的興起與全球化網絡的產生挪移了此一原則例外關係，記憶變成原則而遺忘成為例外⁷。蓋資訊科技在今日已進入到人類日常生活的各種領域，並成為普遍被運用的工具，隨之而來的就是使用者到處留下資料軌跡⁸。例如軟體設計以及線上資料庫等資訊

⁵ 蘋果新聞：被捕報導可搜出 日法院令google刪除，<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703/640542/%E8%A2%AB%E6%8D%95%E5%A0%B1%E5%B0%8E%E5%8F%AF%E6%90%9C%E5%87%BA%E3%80%80%E6%97%A5%E6%B3%95%E9%99%A2%E4%BB%A4google%E5%88%AA%E9%99%A4>，最後瀏覽日：2015年7月3日。

⁶ 關於資料（Daten）與資訊（Information）的差別，許多文獻係當作同義詞使用，甚至我國大法官亦使用「資料自主權」之概念，亦有別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資訊自決權」。然而學理上對此係清楚區分，前者係指可紀錄資料主體之符號；而後者則係指藉由觀察、信息或資料而在特定脈絡中獲致的意義要素，就此可參見Albers, Datenschutzrecht, § 62 Rn. 10; Trute, in: Alexander Roßnagel (Hg.), Handbuch Datenschutzrecht, 2003, 2.5 Verfassungsrechtliche Grundlagen, Rn. 18. 中文文獻，可參見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頁18以下，2001年1月。

⁷ Mayer-Schönberger, aaO. (Fn. 4), S. 11, 112ff.

⁸ Hoffmann-Riem, aaO. (Fn. 1), S. 513 (514); Masing, NJW 2012, S. 2305 (2306);

科技之目的即在於，將所有資料即時蒐集並盡可能全面地予以連結以形成可資利用的網絡⁹。數位科技使得所有資訊標準化並與電腦兼容，此係意指即便是最複雜的資訊也能以電子化的方式儲存與繼續處理；由於無所不在的數位化，越來越多的資訊被轉譯為二進位的編碼，加上儲存技術的廉價，數位資訊的保存甚至經常要比刪除或遺忘來得便宜¹⁰，以越來越少的代價即可獲得潛在無止境的儲存容量¹¹；資料儲存的便利性、數位時代下蒐集資料便利、查詢成本降低等因素共同構成了網路記憶的背景。而數位化、網絡化與潛在無窮的儲存容量正是網路上無止境記憶的基石¹²。

然而，就如同每個科技進步必然伴隨其負面影響，無限的數位記憶也有其陰暗面。在無遠弗屆的網路時代中，個人資料保護面臨巨大的挑戰，全球資訊網路逐漸淘空資料保護法制度的限制與調控能力¹³。當一方面歌頌「網路不會忘記任何事」時，同時卻也衍生出人們尋求在網路時代下被遺忘的期待¹⁴。此一期待不分國界，其理由或個案情況對應著網路上的眾多資訊態樣更是多樣化。網路不但是個人在（網路）社群中自由開展其人格的媒介，同時也是對於人格發展的危害來源¹⁵。面對如此的兩難困境，法秩序必須有所回

資訊科技上的討論，*Grimm*, DuD 2012, S. 88ff.

⁹ *Boehme-Neßler*, NVwZ 2014, S. 825.

¹⁰ *Mayer-Schönberger*, aaO. (Fn. 4), S. 110f.

¹¹ 資料標準化（Standardisierung）的意義，*Mayer-Schönberger*, aaO. (Fn. 4), S. 73ff.; 更便宜的資料儲存，可見S. 78ff.

¹² *Boehme-Neßler*, aaO. (Fn. 9), S. 825.

¹³ *Heckmann*, NJW 2012, 2631; *Buchholtz*, AöR 140 (2015), S. 123.

¹⁴ *Boehme-Neßler*, aaO. (Fn. 9), S. 826. 另方面，氏亦指出，從人類思維能力與最適化行為調控來看，遺忘也是迫切必要的機制，蓋若過多資料累積於記憶中，反而無從或有礙於採取決定。

¹⁵ 關於網路與個人人格發展的關聯性，文獻上已眾多討論，例可參見 *Ladeur/Gostomzyk*, NJW 2012, S. 710ff.; *Glaser*, NVwZ 2012, S. 1432ff.; *Bull*,

應。而前述關於被遺忘權案例事實在網路巨量的資料與資訊之下每天都可能會發生，私密、難堪或不再想要讓他人知悉的過去往事等等，都體現出資訊時代中人們渴望被遺忘的期待。

另一方面，網路的功能特徵使得法規範與法體系逐漸失其調控能力，網路世界的特性，例如匿名性、網路環境下易於誘使個人放棄對其資訊的支配等¹⁶，試想每天在臉書上的評論或分享照片即可瞭解。網路上到處可見的不實資訊、侵害個人名譽、私密不雅照片等侵害個人人格權的案例層出不窮。而此種危險透過網頁搜尋引擎的利用更為加劇¹⁷，如Google、雅虎等搜尋引擎業者均具有遍及全世界的特徵，搜尋引擎的資料處理透過蒐集、組織各別在原始網頁上公開的資料，不但使得各該資料長久留存，更導致當事人或多或少的詳細輪廓被揭露，而這樣的揭露在以往沒有搜尋引擎的年代係辦不到的¹⁸；再者，搜尋引擎業者所蒐集的個人資料有時是私人與私密的，又或者是雖屬公開但已過時之資訊，因而也衍生出對抗透過網路的人格剖析之人格權保障的需求（Profilschutz）¹⁹。而該個人

NVwZ 2011, S. 257ff.; *Eifert*, Freie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in sozialen Netzen – Rechtlicher Schutz von Voraussetzungen und gegen Gefährdungen der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im Web2.0, S. 253ff.; *Roßnagel*,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zwischen Eigenverantwortung, gesellschaftlicher Selbstregulierung und staatlicher Regulierung, S. 269ff.

¹⁶ *Heckmann*, aaO. (Fn. 13), S. 2631.

¹⁷ 例如在Google輸入特定關鍵字後，即自動提示搜尋的功能（Autocomplete），也可能造成人格權侵害，如特定姓名與侵害名譽事情的連結，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已有裁判處理此一爭議。參見BGH, Urteil v. 14.5.2013 – VI ZR 269/12 (OLG Köln) = JZ 15/16/2013, 789 m. Anm. Ladeur.; auch *Gounalakis*, NJW 2013, S. 2321ff.;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Die digitale Dimension der Grundrechte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5, S. 63f.

¹⁸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37 = JZ 2014, 1011f.; schon BVerfGE 65, 1 (53) – Volkszählung.

¹⁹ *Heckmann*, aaO. (Fn. 13), S. 2631; auch *Hoffmann* u. a., aaO. (Fn. 17), S. 34ff.

資料更可用來預測使用者的行為，所儲存的資訊可以使得未來關於政治（如選舉結果）、經濟甚至是流行病學的預測更為精確（此即所謂「大數據」的功用）²⁰。甚至可以說，想要從無數的網路資料過濾出重要的資訊，沒有搜尋引擎幾乎是不可能想像的。在資訊社會中，資訊被視為有價值的經濟資產，正因如此，如Google般的搜尋引擎業者即享有經濟上與政治上力量²¹。然而，網路媒體上的人格權侵害無法期待如同傳統媒體一般，以反對陳述等機制予以救濟，雖可透過訴訟排除，但該原始網頁的資訊卻已透過其他部落格或社群媒體等方式再予散播，就此法院判決的法律效力即無從及之²²。網路規整的重大困難正在於，個人請求權難以貫徹，甚至經常是不可能的²³。從正面看待，資訊處理與使用的進步可以作為一種科技的賜福；相反地，亦有可能產生無法控制的人格掌控（*Persönlichkeitserfassung*）的危險，而此毋寧亦屬於科技所帶來的厄運²⁴。由此以觀，傳統法律制度與救濟手段需要更貼近網路特性、更為有效的技術與組織上的預防手段來因應。

正是在此脈絡上，歐洲法院（*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EuGH*）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針對網路上的個人資料保護作成指標性判決，判定只要該當事人享有資料保護法上的刪除請求權，搜尋引擎業者Google即負有義務，將特定連結從其搜尋結果列上移除²⁵。文獻與媒體報導多簡稱為「被遺忘權」判決。本文即旨在透

²⁰ 就此可參見Weichert, DuD 2014, S. 831ff. 以及APuZ 11-12/2015, Big Data專輯。

²¹ Boehme-Neßler, aaO. (Fn. 9), S. 825.

²² Ladeur/Gostomzyk, aaO. (Fn. 15), S. 713f.

²³ Bull, aaO. (Fn. 15), S. 261.

²⁴ Martini, JA 2009, S. 839 (845).

²⁵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gegen AEPD = JZ 2014, 1009ff. = NVwZ 2014, S. 857ff.

過介紹並分析此一歐洲法院指標性裁判，以釐清其程序與實體面向上所應適用的法規範為何、搜尋引擎業者作為資料保護法制上的責任人（貳、二部分）；其次則是針對判決所肯認「特定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Anspruch auf Nichtanzeige bestimmter Suchergebnisse，下稱為「被遺忘權」）的論據加以探討（貳、三部分）；對此判決有基礎瞭解後，則試圖從我國憲法及德國基本法範圍中探求該請求權的憲法基礎及其衡量因素（參部分）；再者，如何將此一請求權和憲法上的衡量具體落實於德國及我國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則是第肆部分所擬探討之處；最末則是以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上繼受途徑，以作為本文的結論與展望。就比較法方法論部分，之所以援引德國法，其理由之一即在於德國法就個人資料保護法係歐洲個人資料保護發展實屬先驅，相關理論建構與發展亦影響歐洲法甚深，包括黑森邦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係舉世首部針對個人資料提供保障之專法，自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之立法始，彼邦即多有針對被遺忘權等機制之論述，足供我國法院及立法實務參考借鏡。

貳、歐洲法院 Google 被遺忘權判決——關於個人資料保護與人格權的指標案例

一、背景與待決爭議

接觸到「被遺忘權」（德文：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英文：Right to be forgotten）²⁶這個概念時，或許不免有些令人訝

²⁶ 關於歐洲法院所提出之「被遺忘權」，德文文獻上雖有以„Recht auf Vergessen“表示，如Buchholtz, aaO. (Fn. 13), S. 121ff.; Nolte, ZRP 2011, S. 236ff.; Koreng/Feldmann, ZD 2012, S. 311ff.; Piltz, K & R 2014, S. 566 (569ff.).

異，蓋其第一眼看來非屬法學範疇²⁷。依德國學者Gerrit Hornung/Kai Hofmann的說明，「遺忘」（Vergessen）或是「被遺忘」（Vergessenwerden）首先均是指涉人類現象，亦即儲存於記憶中資訊的逐步喪失。「遺忘」本身因其人類學的隱含內容而具有高度的——同時也是情緒性的——連結能力，此一能力或許是被遺忘權近來得以成功開展的理由。特別是除了其規範意涵外，尚可作為「網路不會忘記任何事」的對照²⁸。正如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提倡「數位時代下的遺忘美德」，遺忘不只是個人行為；同時社會也會遺忘我們。如此的社會遺忘給予人們重新開始的機會²⁹。

另一方面，在抽象層次上，「遺忘」作為法律概念的意涵始終係與匿名性或使用假名（Anonymität und Pseudonymität）密切相關，這不只是對於個人人格開展與人格表現，同時也是對於確保開放的社會秩序具有重大意義。因此，「遺忘」本身被理解為再匿名或匿名的重建（re-anonymisieren, Wiederherstellung von Anonymität）³⁰。除了「對於任何人的遺忘」的匿名，亦包括使用假名或其他更換可得特定個人特徵的更名，除非掌握資料者可依連結規則得知者³¹。只要有足夠的匿名化保障，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相當程度上即無適用，蓋匿名化資料已非個人相關資料，因而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範圍。然而，需留意的是，加密技術是取決於當下時點的科技

惟絕大多數文獻基於此一權利於語義上係「被動」地為社會所遺忘，因此多以被動式的動詞轉變為名詞表示，而以„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表達，本文亦從之。

²⁷ Buchholtz, aaO. (Fn. 13), S. 122.

²⁸ Hornung/Hofmann, JZ 2013, S. 163 (164).

²⁹ Mayer-Schönberger, aaO. (Fn. 4), S. 23f.

³⁰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S. 164; Spindler, JZ 2014, S. 981.

³¹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S. 164. 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 BDSG）已有明定。Vgl. § 3 Abs. 6a BDSG.

技術，未來仍有可能被破譯（*Dechiffrierung*），那麼即不再是匿名資料，個人資料保護的要求即又回復³²。在此意義下，被遺忘權並非指完全在網路上消失匿跡，蓋每個網路使用者都可以將網路上的資料與網頁內容儲存於自己電腦系統中，並且可自行再行公布，原始提供者已不再對其內容有任何支配權限³³。但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任何人欲在茫茫網海中搜尋資料，莫不借助搜尋引擎之便利，因此「被遺忘權」連結到個人對於搜尋引擎業者的主張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此亦可得知，在該歐洲法院裁判前，學理上即曾提出若干「被遺忘」的各種想法與作法，而這些規劃構想或多或少均面臨到現實與理論上的挑戰與質疑。例如透過資訊科技上的技術，自始即限定該儲存之個人資料必須於一定期限經過後即予解消（*Verfallsdatum*）³⁴。此一限期可以透過一定審查期限或法定期限為之，藉此程式，使用者可知悉其圖片或資料放上網路時即附有期限，可稱為「數位橡皮擦」（*digitaler Radiergummi*）³⁵。然而，此一提議一方面未能顧及線上檔案資料庫（*Online-Archive*）的建構，特別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乃至於資訊自由的需求³⁶；另一方面，依網路專家評估在技術上並不可行³⁷。

³² *Kühling/Klar*, NJW 2013, S. 3611 (3613f.)

³³ *Schaar*, Das Ende der Privatsphäre – Der Weg in die Überwachungsgesellschaft, 2009, S. 51.

³⁴ 如 *Mayer-Schönberger*, aaO. (Fn. 4), S. 201ff. 即支持此一立場。

³⁵ *Bull*, aaO. (Fn. 15), S. 257 (260).

³⁶ 就此參見 *Mann*, Muss das Internet Vergessen lernen?, S. 133ff.

³⁷ 詳細立法建議與政策討論，可參見 *Nolte*, aaO. (Fn. 26), S. 236 (237f.); 技術上困難，*Federrath/Fuchs/Herrmann/Maier/Scheuer/Wagner*, DuD 2011, S. 403ff.

綜上所述，歐盟法院裁判所欲處理的被遺忘權僅限於，要求搜尋引擎業者，如本案中的Google，移除特定搜尋結果及其連結，而非在網路上全面刪除相關資訊。然而，考量到搜尋引擎的關鍵地位，此一進展已可謂具有開創性的價值。甚至從制度面而言，德國學者Indra Spiecker gen. Döhmman認定，從二〇一四年歐洲法院關於「預先儲存個人網路活動資訊」（Vorratsdatenspeicherung）³⁸以及本件被遺忘權裁判以觀，歐洲法院已成為歐盟多層級體系中新的憲法法院³⁹。

二、歐盟資料保護指令與基本權憲章的適用範圍

歐洲法院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針對網路上的個人資料保護作成指標性判決，判定只要該當事人享有資料保護法上的刪除請求權，搜尋引擎業者即負有義務，將特定連結從其搜尋結果列上移除⁴⁰。這樣的發展若觀諸其歷來裁判，並不令人意外。蓋其判決係植基於歐盟資料保護指令（EU-Datenschutzrichtlinie, DS-RL）⁴¹、歐盟基本權憲章第7條尊重私人生活基本權以及第8條保障個人資料之權⁴²。此外，裁判作成時尚未生效的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草案

³⁸ EuGH, Urteil v. 8.4.2014 – C-293/12 Digital Rights Ireland Ltd. = JZ 22/2014 m. Anm. Spiecker gen. Döhmman, JZ 2014, S. 1109ff.

³⁹ Spiecker gen. Döhmman, Zur Architektur des europäischen und deutschen Datenschutzes im Zeitalter von Vorratsdatenspeicherung, Big Data und IT-Erhancement im Lichte der Google-Spain-Entscheidung des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s, 2015, S. 61 (82f.); schon dies/Eisenbarth, JZ 2011, S. 169ff.

⁴⁰ JZ 2014, 1009ff. = NVwZ 2014, 857ff.

⁴¹ RL 95/46/EG vom 24.10.1995, ABl 1995 L 281, 31.

⁴² 歐盟基本權憲章第8條規定：「人人均有權享有個人資料之保護(I)。此等資訊應僅得於特定明確目的，且基於當事人同意或其他法律規定之正當依據下，公平地被處理。人人均有權瞭解其個人資料，並有權要求更正其個人資料

第17條亦規定遺忘權與刪除權，對該判決亦有所影響⁴³。可以說，

(II)。應由獨立之主管機關監督上述原則之遵守(III)」。一般性說明，可參見 *Kühling/Seidel/Sivridis*, *Datenschutzrecht*, 2. Aufl., 2011, S. 16ff.; *Jarass*,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2. Aufl., 2013, Art. 7 Rn. 6ff. und Art. 8. 43 目前於歐洲層次規範個人資料保護，除了歐洲基本權憲章第7條及第8條以及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和特定領域的歐盟指令外，一般性的資料保護主要即屬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與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草案兩者，一般性論述可參見 *Albers*, aaO. (Fn. 6), Rn. 19-24; *Britz*, *EuGRZ* 2009, S. 1ff.; *Schneider*, *DV* 44 (2011), S. 499ff. 中文文獻，可參見徐彪豪，被遺忘權近期發展——歐盟法院判決週年後回顧與本土觀察，科技法律透析，27卷1期，頁50-70，2015年11月。

此外，歐盟於1995年所制定之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其基本原則確保了歐盟會員國個人資料基本權利之保障，後續也成為國際相關立法時之參考依據，我國制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有參酌。但由於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制定時為框架式立法模式，歐盟各會員國仍須將相關規定內國法化，導致各會員國間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標準產生差距。歐盟現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指令是第一部解決關於個人資料處理與自由流通保護之指令，主要在於提供歐盟境內關於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之規定。但由於該指令使各會員國之規範不具統一性，且制定之時科技尚屬發展階段。為解決科技發展與各國形成之保護差距，歐盟執委會在2012年1月25日，向歐洲理事會及歐洲議會正式提出「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草案（*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Entwurf, DS-GVO-E*），並於2016年4月27日通過，正式成為歐盟法的一部分，同時並廢止個人資料保護指令。連結可參見：<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CELEX:32016R0679&qid=1491918418084&from=EN>，最後瀏覽日：2017年4月10日。（*VERORDNUNG (EU) 2016/679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7. April 2016*）。關於此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的立法，一般性討論可參見RDV 2/2012專輯；關於被遺忘權部分，可參見*Kalabis/Selzer*, *DuD* 2012, S. 670ff.; *Schneider/Härting*, *ZD* 2012, S. 199-204; *Gstrein*, *ZD* 2012, S. 424-429;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S. 163ff.; *Kodde*, *ZD* 2013, S. 115ff.

新通過之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第17條（刪除權——被遺忘權）之中文譯文如下：

「I. 有下列理由時，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責任人立即刪除其個人資料，且責

這則裁判是處於歐洲法上資料保護法制在時間或內容上劇烈變動的脈絡中⁴⁴。結論上來說，法院少見地刻意與歐洲法院總辯官⁴⁵（Generalanwalt）Niilo Jääskinen的見解保持距離⁴⁶，而全面肯認當

任人負有義務，立即刪除該資料：(a)該資料對於資料蒐集或處理的目的已不再必要時；(b)當事人撤回其基於第6條第1項第a款或第9條第2項第a款所為之同意，且無其他繼續處理該資料的法律基礎；(c)資料當事人依第21條第1項針對其個人資料處理提出異議，並且不存在對於資料處理的其他優位正當理由，或當事人依第21條第2項針對資料提出異議者；(d)個人資料以不合法的方式處理之；(e)個人資料之刪除係為履行歐盟法或成員國之法課予責任人之法定義務；(f)由資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所得的個人資料已依第8條第1項廢棄之。

II. 責任人已公開該個人資料並依第1項負有刪除義務者，其應顧及可使用之科技與兼顧執行費用下採取合理措施，包括技術方式，以通知第三方資料當事人，要求他們刪除任何個人資料連結或其個人資料之複製，或要求其個人資料的重製。

III. 第1項及第2項並無適用，倘資料處理在下列情況是必要者：(a)對於自由言論表達與資料之權利行使；(b)為履行法定義務，而此一義務係課予義務人依歐盟法或成員國法所要求之資料處理；或為履行公益之任務或公權力行使之任務時，而移轉予責任人時；(c)依第9條第2項第h款及第i款以及第9條第3項，在公共健康領域內之公益理由時；(d)具有公益之檔案目的、學術或歷史研究目的或依第89條第1項統計目的，只要第1項之權利很有可能將使得這些資料處理的目的實現不可能或重大妨礙者，或(e)為法定請求權之主張、行使或防衛所需」。

惟本則歐洲法院裁判係於2014年作成，仍以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為裁判依據，就此合先敘明。

⁴⁴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55f.

⁴⁵ 國內關於Generalanwalt之譯名不一，有譯為輔佐法官、總辯官或檢察官。本文採取陳靜慧，歐盟法院之組織與功能，載：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頁106，2015年7月，所採譯名（詳細理由於該文註釋6已有說明）。

⁴⁶ GA Jääskinen Schlussanträge des Generalanwalts v. 25.6.2013 - C-131/12 (Google);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138782&doclang=DE>，最後瀏覽日：2017年4月10日。

事人享有此一刪除請求權。其判決脈絡大致係先認定搜尋引擎業者所從事之行為屬資料處理；其次則是界定搜尋引擎業者屬資料保護法上的責任人地位；再者，就歐盟資料保護法制於地域適用範圍上，認定亦及於總部設於美國的Google公司；最後則是處理被遺忘權的要件及其範圍。

(一)實體適用範圍——網頁搜尋與搜尋結果作為獨立資料處理

首先歐洲法院必須決定，是否Google的網頁蒐集程式（Web-crawling applications，亦即網路爬行應用程式）以及搜尋結果屬於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的實體適用範圍之列，亦即，是否Google實際上所為係涉及資料保護指令第2條第b款之「處理個人資料」。蓋網頁蒐集程式的行為係蒐集「所有」於網路上顯現的資料，無論是否與個人相關或連結⁴⁷。就此，法院首先確認，搜尋引擎業者所從事者，係屬於歐盟資料保護指令⁴⁸第2條第b款處理個人資料之列。其透過在網路上自動、持續且有系統地搜尋公開資訊以「提取」資料。尋得的資料係藉助索引程式被篩選、儲存及組織，於業者的伺服器中被儲存並以搜尋結果列的方式重現並提供予使用者⁴⁹。至於各該個人資料業已於網路上公布、搜尋引擎業者本身並未加以更動或是區分資訊或個人資料這點，亦未改變前述認定⁵⁰。就本案而言，Google的網頁蒐集以及公開搜尋結果被認定為獨立的資料處

⁴⁷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1f.

⁴⁸ 以下簡稱為EU-Datenschutzrichtlinie, DS-RL 95/46/EG. 全名為„RICHTLINIE 95/46/EG DES EUROPA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4. Oktober 1995 zum Schutz natürlicher Personen bei der Verarbeitung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und zum freien Datenverkehr“.

⁴⁹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28 = JZ 2014, 1011.

⁵⁰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27, 29 = JZ 2014, 1011.

理，而未深入細節再行區分蒐集、分類、儲存及再公布等步驟⁵¹。

(二) 搜尋引擎業者作為資料保護法上的責任人

就歐洲資料保護相關法制而言，歐盟資料保護指令、德國資料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 BDSG）與歐盟資料保護基本命令（*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並沒有特別針對搜尋引擎的規範⁵²。因此，就搜尋引擎業者的責任而言，歐洲法院於此所採取的立場係與過去德國法院認定有別，亦有別於總辯官意見，而將責任人概念擴及搜尋引擎業者，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干擾人責任（*Störerhaftung*），即便是單純共同作用，亦符合資料保護法上的資料處理⁵³。就上述的資料處理，法院進一步認定搜尋引擎業者 Google 係歐盟資料保護指令（DS-RL 95/46/EG）第2條第d款意義下的「責任人」（*Verantwortlicher*）⁵⁴，蓋其可決定個人資料之資料處理的目的與手段⁵⁵。此外，搜尋引擎業者亦無法將此一責任轉嫁予各該原始網頁經營者而脫免責任，若能藉此脫免責任，不僅有違歐盟指令該款文義，亦悖於該指令採取廣義認定責任人的立法目的⁵⁶。蓋搜尋引擎業者處理個人資料係完全有別於透過原始網頁經

⁵¹ Karg, ZD 2014, S. 359.

⁵²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S. 166.

⁵³ Karg, aaO. (Fn. 51), S. 360; Spindler, aaO. (Fn. 30), S. 983.

⁵⁴ 就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2條第d款之「責任人」一詞，國內有論著（援引英文版本）譯為「控制者」（*controller*），參見楊智傑，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上「被遺忘權利」與「個人反對權」：從2014年西班牙Google v. AEPD案判決出發，國會月刊，43卷7期，頁26，2015年7月。惟筆者認為，「責任人」之譯名較符合國內行政法學界對於行為義務人之概念理解，故仍譯為「責任人」。其意涵依指令第2條第d款係指，「自然人、法人、機關、機構或其他單位，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決定個人資料處理之目的與手段」。

⁵⁵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33 = JZ 2014, S. 1011.

⁵⁶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34 = JZ 2014, S. 1011.

營者的資料處理，因此係獨立於其他與原始網頁相連結的資料處理。搜尋引擎業者的業務行為很大一部分具有遍及全世界的特徵⁵⁷。這也顯示出，搜尋引擎業者的資料處理透過蒐集、組織各該在網路上公開的資訊，將導致或多或少當事人的詳細輪廓被揭露，而這樣的揭露沒有搜尋引擎是辦不到的⁵⁸。因此，搜尋引擎業者之行為該當於資料保護指令之責任人地位。

(三)地域適用範圍

然而，在確定Google所提供服務屬資料處理以及責任人地位後，歐洲法院仍必須面對下列核心問題：當一個歐盟成員國的企業從歐盟以外的地區蒐集、處理或使用歐盟公民的資料時，在什麼條件下該企業必須遵守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的資料保護法律，亦即Google可否以上述資料處理係於美國總部實行，而非由西班牙分公司為之，以作為不適用歐盟指令之抗辯⁵⁹。

在本號裁判之前的多數德國實務見解認為只要母企業與子企業業務關係緊密交織、彼此互為依存關係，子企業得以對於該重要的資料處理過程有顯著影響，即可認定該企業的責任人地位⁶⁰。然而，此種論證明顯地有漏洞，蓋於歐體法可想像的是，不見得必然在母企業與子企業間具有依存或重大影響關係。因此，歐洲法院本

⁵⁷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34f. = JZ 2014, S. 1011.

⁵⁸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37 = JZ 2014, S. 1011f.

⁵⁹ 此一抗辯亦於我國臺北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976號裁定與判決和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抗字第491號裁定中有所討論。

⁶⁰ 僅參見Nolte, NJW 2014, S. 2238 (2239), Fn. 15. 所列實務及學說見解。詳細討論在本號裁判後，如何認定如臉書等跨國社群業者之責任人範圍及其適用困難，參見Hornung, Datenschutzrechtliche Aspekte der Social Media, Kap. 4 Rn. 25ff.

號裁判係從結果取向的論證方式為之⁶¹，而認定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4條第1項第a款並沒有要求該資料處理係「由」所涉及的分公司本身為之，而僅要求「在其業務範圍」（im Rahmen der Tätigkeit）即可⁶²。因此，即便Google位於西班牙的分公司僅從事廣告活動，而資料處理過程係由美國總部為之，亦無礙該指令之適用。再者，從該指令的立法目的觀之，係為提供於個人資料處理時，一項有效且全面保障，特別是基於個人私生活保障之權所導出，因此該適用範圍不應從嚴解釋，而毋寧應從寬解釋⁶³。此外，亦可從該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補充理由第18點至第20點可推知，指令立法者的意圖在於，盡可能廣泛地認定適用範圍，以避免藉由巧妙地選定事業體位置的策略，規避歐盟資料保護的要求⁶⁴。如同Indra. Spiecker gen. Döhmman/Maximilian Steinbeis所評論，「誰在此從事廣告業務以賺錢，就必須遵守此處所適用的現行法」⁶⁵。因此，本件裁判的意義一方面在於擴張歐盟相關資料保護法制在場域上的適用範圍，及於外國企業於歐盟成員國設立營業點，於歐盟內

⁶¹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3.

⁶²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52 = JZ 2014, 1013. 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關於適用範圍亦規定，只要責任人在德國境內（im Inland, § 1 Abs. 5 Satz 2 BDSG）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即便該責任人並非位於歐盟境內，仍有所適用，以避免該資料保護法輕易地被規避。Vgl. Nolte, aaO. (Fn. 26), S. 236 (238).

⁶³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53 = JZ 2014, 1013.

⁶⁴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54 = JZ 2014, 1013; auch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3; Nolte, aaO. (Fn. 60), S. 2238 (2239); 不同意見，對於歐洲法院擴張地域適用範圍的深入批評，可參見 Arning/Moos/Schefzig, CR 2014, S. 447 (449).

⁶⁵ Spiecker gen. Döhmman/Steinbeis, „Der EuGH erfindet sich gerade neu“, VerfBlog, 2014/5/14; <http://www.verfassungsblog.de/der-eugh-erfindet-sich-gerade-neu/>，最後瀏覽日：2017年4月10日。

從事營業活動；另一方面在於強調資料保護的特殊重要性相對於公眾的資訊利益與資料處理（網路）業者的經濟利益，確保對於歐盟公民之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亦應符合歐盟資料保護法制的要求⁶⁶。

三、特定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被遺忘權

在確立資料保護法上責任人的地位後，處理個人資料，只有在符合個人同意或法定許可之構成要件下始屬合法⁶⁷。由於Google所處理之個人資料潛在上是任何人，因此藉由當事人同意的解決模式自始即無可能。依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7條第f款規定，當該資料處理係為實現責任人（如搜尋引擎業者之企業上與經濟上活動自由）或受該資料之傳遞的第三人（如網路使用者的資訊自由）的正當利益所必要時，只要當事人之利益或基本權及基本自由，特別是私領域保障（歐盟人權憲章第7條）不會高於前述之正當利益，即可為之；反之，若於此必要的利益衡量係有利於當事人者，則依同指令第12條第b款當事人享有刪除請求權與第14條第1項第a款異議權⁶⁸。於此，資料處理的結果即為搜尋結果，此一刪除請求權即為特定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Anspruch auf Nichtanzeige

⁶⁶ Nolte, aaO. (Fn. 60), S. 2238f.

⁶⁷ 僅參見Albers, aaO. (Fn. 6), Rn. 54.

⁶⁸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9ff. = JZ 2014, 1016.

指令第12條第b款規定：「成員國應確保每一個當事人有權要求責任人……(b)當資料處理不符合本指令規定時，視情況可要求更正、刪除或限制該資料，特別是當該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時」；

指令第14條第1項第a款：「成員國應賦予當事人有權，(a)至少於第7條(e)及(f)的情形，任何時間基於其特殊情事所生之重大正當事由，得提出對其資料處理之異議；除非各該成員國立法另有規定。當其異議具有正當事由時，責任人所進行之資料處理即不得再涉及其資料」。

bestimmter Suchergebnisse)⁶⁹、或更精確的名稱是「難以檢索之權」(Recht auf erschwerte Auffindbarkeit)⁷⁰。即便容易誤解，且歐洲法院本身亦未使用「被遺忘權」之名，惟絕大多數評論或介紹均以此為名，故本文雖對該名詞使用不夠精確而有所保留，但仍沿用被遺忘權之名。

(一) 搜尋結果與原始網頁的區分

歐洲法院裁判理由中雖未明示，但由其裁判脈絡可知係採取兩項基本立場：1. 搜尋結果與原始網頁的區分；2. 個人利益優先的衡量取向。前者大抵上較無爭議，但後者則容易引人誤解。

首先歐洲法院確認，當原始來源的資料公布已屬違法、實質上不正确或已過時、乃至於原先使用目的不再相符而無必要再予保存時，這些情況下可認定為紅線區，當事人可請求刪除之⁷¹。歐洲法院進一步指出，不僅是該個人資料處理不符合歐盟資料保護指令，可主張此一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若一開始實質上正確資料的合法處理，也有可能因時間經過而不再符合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6條第1項第c款至第e款要求，該資料對於蒐集與處理的目的而言，目的已不存在或不再必要時，亦可能導出此一請求權⁷²。由此

⁶⁹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3f.; Karg, aaO. (Fn. 51), S. 360. 類似說法，如Markus Lang稱為「去除搜尋結果列之連結的請求權」(Anspruch auf Entfernung von Links in einer Ergebnisliste)，Lang, K & R 2014, S. 449 (450).

⁷⁰ von Lewinski, AfP 2015, S. 1 (2).

⁷¹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2 = JZ 2014, S. 1016.

⁷²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2f. = JZ 2014, S. 1016.

指令第6條：「成員國應規定，個人資料(a)係依誠信及合法地被處理；(b)必須基於特定明確且合法目的而蒐集，並且不得以與此目的有違的方式繼續處理。只要成員國有規定適當保障，則該資料之繼續處理得基於歷史、統計或學術目的為之；(c)必須與其蒐集或繼續處理之目的相符，且屬必要且不得逾

亦可得知，如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犯罪嫌疑人報導和線上檔案的裁判相仿⁷³，歐洲法院亦採取原始資料處理與更新的資料處理的區別。搜尋結果列必須一再更新，因此於搜尋請求提出時，該資料處理也必須合於指令。搜尋引擎業者的合法性要件，無涉其他責任人的合法或違法的資料處理，必須單獨予以調查確定，即便該原始網頁上的資訊未同時刪除，甚至是合法的，也可能構成對於搜尋引擎業者的刪除請求權⁷⁴。就此衡量而言，在網路上原始網頁可發現的資訊係微不足道的，蓋於此由歐盟人權憲章第7條及第8條所生之侵害並不是由於在各別網頁上可以找到所致，而是所有在網路上可以找到關於當事人的資訊所聚集而成，其資訊價值遠超出原始公開的範圍，亦即人格權的侵害毋寧是透過搜尋結果的聚集作用以及所生的更容易被尋得的結果⁷⁵。在本案事實中，原始網頁中的資訊已甚難直接接觸，因此該個人的私領域保障與資料保護之權受侵害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搜尋引擎業者發揮「聚集」作用所致。但單由搜尋引擎聚集本身並不必然導出必須去列表，而毋寧須取向於利益衡量的結果，特別是當原始網頁之資訊為合法時，此一衡量即格外困難。

因此總結來說，對於搜尋引擎業者而言，於原始來源網頁所為

越該目的；(d)必須實質正確，且必要時保持最新狀態；(e)基於原蒐集目的或繼續處理目的之實現已不再有必要，保留該當事人之識別時，可刪除之。成員國應提供當事人針對已超出歷史、統計或學術目的以外之資料予以適當保障。」

⁷³ Dazu vgl. *Ruttig*, AfP 2013, S. 372-376.

⁷⁴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8 = JZ 2014, S. 1015. 對此亦有批評，認為搜尋引擎業者的遮蔽義務何以較原始網頁業者的刪除義務更為嚴格，就此可參見 *Arning/Moos/Schefzig*, aaO. (Fn. 64), S. 450f.

⁷⁵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2f. = JZ 2014, 1016; auch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5.

個人資料的公開若已屬不合法者，當事人之異議權即可成立，通常即可導出搜尋引擎業者的清除義務。此種情況通常是該原始網頁公開係違反刑事法規、實質上不正確或已過時⁷⁶；其次，若原始公布網頁上的違法性不甚明顯或實際上不存在違法情況時，則比較難以判定，需進一步檢視利益衡量的結果而定⁷⁷。

(二)個人利益優先的衡量取向

有別於歐洲法院總辯官Niilo Jääskinen的見解，其見解認為既非經營者與網路使用者一邊的利益，亦非另一邊將當事人利益為優先，亦即兩者並無優先關係；歐洲法院係認定資料保護與人格權保障為優先：「雖然當事人所受保障的權利一般而言係優於網路使用者的利益；當下所面臨的案件中的衡量係繫於所涉及資訊種類、當事人私生活的敏感度以及公眾接近資訊的利益，而此一利益會隨著當事人在公眾生活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由於當事人基於歐洲人權憲章第7條及第8條之基本權利應可要求，相關資訊不得再列於搜尋結果列中以供廣大公眾檢閱，原則上當事人的基本權利不只優先於搜尋引擎業者的經濟利益，並且也優於廣大公眾透過藉由以當事人姓名而搜尋以接近資訊的利益」，因而認定當事人有權請求Google刪除相關搜尋結果⁷⁸。此一衡量立場基本權也符合歐洲法上相當重視個人資料保護的趨勢，如以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補充理由第10點即已表明，應保障基本權與基本自由，特別是私領域具有高度的保障水準⁷⁹。於此依歐洲法院見解，此一權利並不

⁷⁶ Karg, aaO. (Fn. 51), S. 361.

⁷⁷ 清楚區分兩者，並分別討論在歐洲法院裁判後，兩者各自責任範圍，可參見 Ziebarth, ZD 2014, S. 394 (397f.)

⁷⁸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5, 97 = JZ 2014, S. 1016.

⁷⁹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5f.

取決於損害證明、亦不取決於資訊處理的違法性，而僅繫於資訊重要性⁸⁰，甚至資料正確性亦非要件⁸¹。原則上當事人受歐洲基本權憲章第7條及第8條所保障之權利一般而言優於網路使用者的利益，惟例外情況亦可為不同處理。然而，此一判決立場並不得解讀為絕對的個人資料保護，而毋寧是取向於開放衡量的過程。其衡量特別取決於所涉及資訊的種類、侵害個人私生活的嚴重性以及公眾資訊利益的重要性，例如當事人在公眾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等因素⁸²。

由此判決立場亦可推知，在歐洲法院的眼光下，搜尋引擎業者不再是無責的第三人，而毋寧是被揭穿的、深具影響力的「幕後操縱者」（*einflussreiche Strippenzieher*）⁸³。但較受批評的是，歐洲法院的見解易被錯誤解讀為利於人格權保障的推定優先，甚至是「資訊財產」的地位。然而，學理上已有正確指出，「類似財產的資料支配」並非合理的利益分配，亦非歐洲法院所意指。歐洲法院前述立場不可一般化，而僅係面對具有強大市場力量的搜尋引擎業者所生的特殊危險情形所為之評價⁸⁴。

⁸⁰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6 = JZ 2014, S. 1016;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2.

⁸¹ 如同 *Spindler*, aaO. (Fn. 30), S. 985. 所指出，系爭個案中西班牙的報紙所報導的情況符合事實。但反之，對於實質上不正確的資訊而言，當事人利益自然優先，蓋公眾對於不正確的資料並無利益可言。同此見解，如 *Nolte*, aaO. (Fn. 60), S. 2241. 指出，依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2項第2款及同條第4項規定，當責任人無法證明其資料正確性時，亦即事態不明者（*non liquet*），該個人資料即必須刪除。

⁸²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1 = JZ 2014, 1015; *Nolte*, aaO. (Fn. 60), S. 2241.

⁸³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3.

⁸⁴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3.

(三)不適用媒體特權

搜尋引擎業者，如Google的經濟利益原則上無法正當化可能造成當事人人格權侵害的資料處理⁸⁵，且相較於原始網頁編輯者得主張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9條媒體特權⁸⁶，搜尋引擎業者並無法主張媒體特權⁸⁷，法院拒絕Google援引新聞自由，因此關於新聞法上關於媒體特權的相關裁判並無法直接適用於此處的衡量過程⁸⁸。然而，此一立場在學理上不無爭議，蓋關於搜尋引擎業者的搜尋行為與搜尋結果表列屬於業者對於所搜尋內容重要性的價值判斷，應屬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1項第1句言論自由保障之列⁸⁹。倘若無搜尋引擎的協助，網路使用者只能憑運氣從網路上的言論與資訊的多樣性中加以利用，於此國家應負有義務，確保自由的資訊暢通。況且在傳統媒體影響力漸趨減弱時，固守傳統媒體特權適用範圍的見解未必合理⁹⁰。

惟此一反對見解未能顧及搜尋引擎與媒體間的根本差異性：蓋搜尋引擎業者所為之行為並沒有自己選擇資訊的部分，亦即人為未能有所影響，而僅係回溯到依照特定資訊的人氣或知名程度所反映到統計上的數值，經由運算公式所自動得出搜尋結果⁹¹。換言之，

⁸⁵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1 = JZ 2014, S. 1015.

⁸⁶ Art. 80 I DS-GVO-E und § 41 BDSG. 亦有規定資料保護法上的媒體特權。

⁸⁷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5 = JZ 2014, 1015. 關於資料保護法上的媒體特權，可參見Paschke, Medienrecht, 3. Aufl., 2009, Rn. 397ff.

⁸⁸ Karg, aaO. (Fn. 51), S. 360.

⁸⁹ Milstein/Lippold, NVwZ 2013, S. 182 (185); Spindler, aaO. (Fn. 30), S. 987及其註釋82所附實務見解。

⁹⁰ Spindler, aaO. (Fn. 30), S. 987; 一般性認定媒體特權應採取寬大、自由主義式 (liberale Auslegung des Medienprivilegs als Ausweg) 解釋者 (惟未觸及搜尋引擎業者)，參見Koreng/Feldmann, aaO. (Fn. 26), S. 314.

⁹¹ 詳細討論搜尋引擎的技術運作方式，可參見Milstein/Lippold, aaO. (Fn. 89), S.

並沒有包括類似新聞、廣電媒體般的編輯自由可言，更遑論有媒體查證義務等要求。而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媒體特權係來自於憲法上保障新聞及廣電自由，透過人為蒐集並處理資料，亦即編輯自由乃其核心。以德國法為例，資料保護法的立法者即在考量此一基本權衝突情況下，賦予媒體特權以作為解決之道⁹²。但此一立法目的於搜尋引擎業者並不存在，因此歐洲法院見解似較可採。但若個人對於原始網頁所有者（如新聞媒體線上版）行使被遺忘權時，則必須考量該媒體特權，於衡量時予以充分斟酌，自不待言。

四小 結

總結來看，在本件判決前，歐盟資料保護指令是否適用於搜尋引擎業者，不無爭議；退步言，即便認定有所適用，但相關當事人究竟有何權利可資主張、其請求權要件如何等，例如是否需要主張權利受損害或原始網頁上的資料係屬違法始得成立等問題，亦不無疑義。而本件判決即提供一項資料保護法上的請求權基礎，對於資訊社會中的人格權保障提供有力的保護措施，可以說是人格權保障的里程碑，同時減輕因網路上不實或過時之資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然而，由於歐洲法院在具體化被遺忘權的要件上，關於憲法上

183f. 審查意見之一認為，若在歐洲法院判決後，Google針對行使被遺忘權的案件採取「個案審查」，逐案決定是否移除。如是，則是否亦類似行使編輯權的媒體，如個人對Google判斷不服（如不予移除）時，提起爭訟時，此時Google是否可主張媒體特權？筆者認為此一提問甚值思考，惟或許更應思考的是，Google針對被遺忘權是否成立所行使的「個案審查」，是否能與媒體編輯權相提並論？前者所著重的應屬被遺忘權成立要件，而後者的意思形成過程明顯空間較大。因此，本文認為即便兩者或有部分類似性，但性質上似仍有所不同。

⁹² Vgl. Paschke, aaO. (Fn. 87), Rn. 398f.; auch Dörr/Schwartzmann, Medienrecht, 5. Aufl., 2015, Rn. 370ff.

保障基礎與具體衡量時應考慮的參數，並未有更為深入的闡述，因此有必要對此再進一步加以討論。

參、憲法基礎與衡量模式

如前所述，在資訊社會中個人不僅想要被記得，同樣也有想要被遺忘的期待。然而，在社會、政治上的討論中法政策上有價值的期待並不必然等同於憲法上的要求，因此回溯探源憲法上的基礎，即有其必要⁹³。在初步檢視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的脈絡後，應可回頭探求在我國憲法規範秩序下，個人資料應受到如何的保障。再者，由於德國學界針對歐洲法院的裁判亦有不少文獻討論，蓋歐洲法對於德國資料保護法制已有深遠的影響⁹⁴。為了更進一步瞭解被遺忘權如何被內國資料保護法所落實，同時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前身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其無論是立法體系架構或是具體條文內容亦多參酌德國資料保護法為比較、繼受的對象⁹⁵。因此，本文亦參酌德國學理及其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釐清其中的憲法基礎與法益衡量模式，以此為基礎探討我國可能繼受被遺忘權的方式。

一、被遺忘權的憲法基礎

(一)我國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

基於成文憲法的要求，探求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必須先檢視憲法上列舉基本權利是否能提供保障。此處並非全面性開展憲法上對

⁹³ Herzog, Geleitwort, S. 5 (7).

⁹⁴ Vgl.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13ff.

⁹⁵ 僅參見李震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回顧與前瞻，中正法學集刊，14期，頁35以下，2004年1月。

於個人資料的保障，而毋寧著重於探求在我國憲法基本權體系中被遺忘權之憲法基礎。

我國憲法第12條明文：「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中，將其解為：「旨在確保人民對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此項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然而，從前述定義中未能凸顯的是此條所欲保障的範圍僅限於通訊過程，蓋當個人若欲跨越距離進行遠端溝通時，必須仰賴其無法完全控制的溝通工具。因此，秘密通訊自由即在保障人民藉各種通訊方式傳遞資訊、意見或思想時，不受國家公權力或私人通訊媒介者非法地拆閱、隱匿、竊聽、搜索扣押或探求內容等侵犯⁹⁶。其中通訊過程中的通訊「內容」以及通訊「情境」，均受秘密通訊自由保障。通訊之「內容」秘密性為保障雙方通話之秘密性不受第三人得知⁹⁷，如當事人間透過Skype等網路電話或即時通訊等軟體傳遞個人資訊者，在傳遞過程中即屬秘密通訊自由所保障。然而，網路上資料流傳並不必然屬於通訊過程中所生之資料，蓋如搜尋引擎業者蒐集網路中由各原始網頁經營者所公開的個人資訊，即非屬秘密通訊自由保護所及。

因此，就非屬於前述憲法第12條所保障之資料者，釋憲實務上

⁹⁶ *Bäcker*, Die Vertraulichkeit der Internetkommunikation, S. 99 (102ff.); auch *Schwabenbauer*, AöR 137 (2012), 1ff.; 李震山，公權力運用定位科技措施與基本權利保障，載：二十一世紀公法學的新課題——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頁348，2008年10月。

⁹⁷ 詹鎮榮，基本權各論基礎講座(5)——秘密通訊自由，法學講座，21期，頁4，2003年9月。

即由憲法第22條未列舉之基本權，導出隱私權及資料自主權的保障。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與第六〇三號解釋均提及「隱私權」，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謂：「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創設出於憲法並未明文之隱私權；而於大法官釋字第六〇三號解釋中，更進一步地對於個人資訊方面之隱私權加以闡述：「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此號解釋在概念上兼用美國法上之資訊隱私權以及德國法上之資訊自決權，惟美國法所強調之資訊須具有「隱私」特性，亦即必須具備「合理隱私期待」之資訊始屬之，此與德國法強調關於個人資訊自主決定，兩者重點仍有別。此一區別在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新聞採訪者跟追案中有進一步的釐清：「系爭規定（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所保護者，為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其中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第六〇三號解釋參照）；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亦與上開闡釋之一般行為自由相同，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自由權利，惟基

於人性尊嚴理念，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對個人前述自由權利之保護，並不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在公共場域中，人人皆有受憲法保障之行動自由。」此號解釋係針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限制新聞採訪者於公共場域中以跟追行為方式進行新聞採訪行為。或係因案例事實與解釋標的係於公共場域之故，因此大法官並未再提及資訊隱私權之用語，轉而強調個人資料之自主權。

總的來看，大法官對於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保護必要性已有所意識，但未能明白表示兩者間的關鍵差異性⁹⁸：前者在於保障個人資訊流通得以介入，賦予個人對於自身相關之資訊，能擁有決定在何種範圍內、何時、向何人、以何種方式揭露或處分使用之自主權，亦即「資訊自決」；而後者似乎置重於「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用語）之保障。特別是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指出：「其中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應可認定大法官對此區分已有所意識。然而，受限於釋憲個案事實及解釋標的，大法官迄今未能處理於網路上之個人資料究竟受何種基本權之保障，所處理的多限於個人對抗國家之防禦權面向（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除外，但解釋中亦未能有所凸顯），更遑論

⁹⁸ 國內有學者認為，「資訊隱私權或資訊自主權似僅為名稱之差異，而可互用」，參見黃昭元，無指紋則無身分證？換發國民身分證與強制全民捺指紋的憲法爭議分析，載：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470，2005年9月。惟學理上有不同見解，如邱文聰，從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概念區分——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的結構性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68期，頁172-189，2009年5月；劉靜怡，不算進步的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初步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83期，頁147-164，2010年8月。

就個人與私人搜尋引擎業者彼此間之基本權關係、乃至於可得主張之資料保護的請求權。關於如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所涉及的基本權關係與衡量因素，我國學理及實務上尚缺乏相關經驗。考量到我國關於憲法解釋及資料保護法制多有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實務及聯邦資料保護法；再者，德國法就個人資料保護法係歐洲發展之先驅，相關理論建構與發展亦影響歐洲法甚深，兩者處於相互影響的狀態，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檢視德國法上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衡量參數，以及學理上如何解釋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以回應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所帶來的影響。

(二)德國資料保護的憲法基礎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案所提出「資訊自決權」無疑問地屬於個人資訊保護理念落實於德國的里程碑⁹⁹。此一裁判不僅被譽為是德國資料保護法制上的大憲章（*Magna Carta*），而所提出資訊自決權亦被界定為憲法上人格權的下位類型¹⁰⁰。在該判決中憲法法院指出，人民有權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在自動化資料處理的條件下，任何資料都有新的價值，亦即不再有無關緊要的資料¹⁰¹。憲法法院甚至於一九九一年的裁判中，明確提到

⁹⁹ *Hoffmann-Riem*, 1984 oder 2004 – Datenschutz im Zeichen der wachsenden Gefährdung durch Private, S. 153. 關於人口普查案評釋，可參見 *Schenke*, NJW 1987, S. 2777-2786.

¹⁰⁰ Vgl. *Hoffmann-Riem*, aaO. (Fn. 1), S. 515, 519; *Grimm*, JZ 2013, S. 585; *Albers*, Umgang mit personenbezogenen Informationen und Daten, § 22 Rn. 57ff.; 而 *Trute*, aaO. (Fn. 6), Rn. 1. 則認為，個人資料的憲法上保障若僅強調保障「自己」資料的利益，是不足的。蓋其未能凸顯出個人透過資訊參與溝通的面向。

¹⁰¹ BVerfGE 61, 1 (43). 關於德國基本法與歐洲人權公約中之個人資料保護的發

「資料保護基本權」(Grundrecht auf Datenschutz)¹⁰²。然而，此一裁判尚處於「類比」時代所作成，因此憲法法院尚未能深入探究數位媒體的特殊性¹⁰³。直至二〇〇八年憲法法院針對所謂「線上搜索」的問題，從一般人格權(基本法第2條第1項結合第1條第1項)中導出了「保障資訊科技系統中之祕密性與整全性之基本權」(das Grundrecht auf Gewährleistung der Vertraulichkeit und Integrität informationstechnischer Systeme)¹⁰⁴。相較於資訊自決權，憲法法院所提出此一新的基本權在時間點上可提供更早的、可主觀化的請求權；且此一基本權由其「保障」的概念(Grundrecht auf Gewährleistung)即可得知，重點在於基本權客觀功能面向，特別是保護義務功能¹⁰⁵。

正如德國學者Gabriele Buchholtz所指出，雖然不是量身訂作，但憲法法院上述裁判已為被遺忘權奠定穩固的憲法基礎。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上述裁判係限於國家與人民間的關係，而此處所探討的問題是，私部門中網路參與者彼此間的爭議¹⁰⁶。但這並非意指基本權規範於此不生作用，而毋寧應強調的是兩者作用有別：考量

展，可參見Wittinger, Festschrift für Rudolf Wendt zum 70. Geburtstag, S. 493ff.

¹⁰² BVerfG-Urteil vom 27.6.1991 (2 BvR 1493/89); 此外，亦有若干黨團及學者倡議資料保護基本權應入憲，相關討論參見Kloepfer/Schärdel, JZ 2009, S. 453ff.; Schulz, ZG 2010, S. 358ff.; Schliesky/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Schutzpflichten und Drittwirkung im Internet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4, S. 150ff.

¹⁰³ Buchholtz, aaO. (Fn. 13), 128.

¹⁰⁴ BVerfGE 120, 274.

¹⁰⁵ Schliesky/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02), S. 111.

¹⁰⁶ Buchholtz, aaO. (Fn. 13), 128. 而Wolfgang Hoffmann-Riem正確指出，原本從人口普查案以來，針對防禦來自國家對於個人資料行為所發展出的保護規範，對於對抗當前資訊社會中來自於私人對於資訊自決權的危害卻僅具有附帶且甚為微弱的貫徹能力。Hoffmann-Riem, aaO. (Fn. 99), S. 154.

到私人與私人間權利地位與國家與人民間權力關係的差異性，憲法法院發展出一連串關於基本權第三人效力（或稱擴散作用）及保護義務的裁判¹⁰⁷，自然也及於資訊自決權與資料保護法制¹⁰⁸。Matthias Bäcker特別指出，針對國家的資訊行為所生的憲法上要求與一般法律上的具體形塑，即與針對私人資訊行為有別。基本權針對私人資料行為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所生的作用，即非防禦權面向，而是基本權保護義務面向¹⁰⁹。

有別於美國法係從隱私權出發，限於具有「合理隱私期待」之資料始受隱私權保障，對於公眾可及或是從私人處所取得的資料原則上並不具有憲法上基本權保障，德國及歐洲法上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甚早即賦予基本權地位¹¹⁰，德國黑森邦於一九七〇年九月更是

¹⁰⁷ 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的裁判實例可參見*Papier*,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 55 Rn. 25-46; *Jarass*, FS 50 Jahre BVerfG, S. 35ff. 而德國學者Matthias Ruffert在檢視歷年來憲法法院關於私法的裁判實務後指出，「基本權第三人效力」已不再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的釋義學重心所在，保護義務的論證模式已取代第三人效力的論述。就此參見，*Ruffert*, JZ 2009, S. 389 (398). 關於以保護義務討論基本權的私法效力，應屬德國學界多數見解*Ruffert*, *Vorrang der Verfassung und Eigenständigkeit des Privatrechts*, 2001, S. 252f.; *Oeter*, AöR 119 (1994), 529 (537f., 549ff.); *Epping*, *Grundrechte*, 6. Aufl., 2014, Rn. 350ff.; *Lenz/Leydecker*, ZG 2006, S. 407 (410). 有鑑於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理論未能更深入地開展其釋義學基礎，憲法法院在特別在*Handelsvertreter*一案裁判中，亦藉由保護義務的釋義學模式，開展基本權於私法的效力。Vgl. BVerfGE 81, 242 (253ff.)

¹⁰⁸ Nur vgl. *Schliesky/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02), S. 82ff.; auch *Greve*, *Festschrift für Michael Kloepfer*, S. 665 (671ff.).

¹⁰⁹ *Bäcker*, *Der Staat* 2012, 91 (98ff.); auch *Masing*, aaO. (Fn. 8), 2305 (2306ff.); *Grimm*, aaO. (Fn. 100), 585 (587ff.);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54; *Ladeur*, *Schutzpflcht gegenüber privaten Gefährdungen*, § 9 Rn. 2, 6.

¹¹⁰ Überblick dazu *Weichert*, RDV 2012, S. 113ff.; *Weichert*, *Zur Kontrolle von Datenerhebung und -nutzung durch global agierende soziale Netzwerke und*

制訂世界上第一部資料保護的專法¹¹¹。以本案中所涉及的個人資料為例，若依美國法上認定隱私權保障範圍，甚難想像會落入基本權利保障之列¹¹²。德國基本法下的基本權體系，針對資料保護除了透過憲法法院藉由人格權所導出的資訊自決權提供保障外，基本法第10條所保障通訊祕密、以及第13條住所不得侵犯所提供的特別保障、乃至於一般人格權作為概括條款均可提供個人資料在憲法基本權上的全面且完整保障¹¹³。若涉及特別基本權保護領域或IT基本權者，即依各該基本權審查，資訊自決權係提供概括、備位的保障¹¹⁴。個人資訊自決權係從人格保障所導出，為限制國家或私人資訊力量，並為其在法律上劃定界限。資訊自決權係將行為自由與私密性的基本權保障前置，藉此可於人格危險的前階段即予以保障¹¹⁵。而被遺忘權的意義正在於，個人資料作為憲法上保護法益不僅在資料處理的前階段透過當事人同意予以保障，同時更延伸於經過一定時間後，當事人基於其人格保障，對其個人資料的掌握與影響可能性。

sonstige Internet-Unternehmen, S. 151ff.

¹¹¹ Albers, aaO. (Fn. 6), Rn. 2. 嚴格說來，資料保護的歷史並非始於黑森邦資料保護法或是聯邦憲法法院人口普查案，在此之前，資料保護法即已透過其他方式，有所規範，但早期仍與警察安全法制密切連結。就此參見 von Lewinski, Geschichte des Datenschutzrechts von 1600 bis 1977, S. 196ff.

¹¹² 因此，本件裁判也招致了不少來自美國輿論與學界的反彈聲浪，參見 Hoeren, ZD 2014, S. 325ff.

¹¹³ Vgl. Bäcker, aaO. (Fn. 96), S. 99ff.; Albers, aaO. (Fn. 100), Rn. 62ff.

¹¹⁴ Bäcker, aaO. (Fn. 96), S. 133f.; auch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51ff.

¹¹⁵ Bäcker, aaO. (Fn. 96), S. 120; Bull, NJW 2006, 1617 (1623); auch BVerfGE 118, 168 (184f.)- Zur Verfassungsmäßigkeit des automatisierten Abrufs von Kontostammdaten.

在法律意義上與被遺忘權更為具體相關的是，憲法法院於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作成的第一次「雷巴赫判決」（*Lebach-Urteil*）以及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作的第二次「雷巴赫裁定」（*Lebach Beschluss*），兩案均涉及廣播電視自由和犯罪人人格權保護衝突的問題¹¹⁶。針對媒體犯罪回顧報導的紀錄片，是否得揭露當事人的身分資料和刑事訴追過程等事實，憲法法院必須衡量被報導者身分確認可能性與匿名程度、報導與犯罪事實時間間隔、受刑人再社會化可能性等因素，以判定是否得以播出。就此而言，憲法法院認定，在一定期間經過後，公眾對此犯罪事實知悉的資訊利益與受刑人再社會化的人格利益，並非同一等級；然而，憲法法院亦指明，一般人格權亦未賦予犯罪行為人完全免於面對公眾的權利，當已為匿名或改名處理而不再得以確認行為人時，即不侵害行為人之人格權。至此，憲法法院在兩次雷巴赫裁判中即已隱含「被遺忘」的社會必要性（於此，即屬再社會化利益），作為刪除請求權的被遺忘權與尊重人格自由開展之人格權緊密連結；另一方面，衡量因素上也不能只考量人格權保障的時間因素，也必須顧及網路通訊的正當利益¹¹⁷。

二、個人資料與時間經過作為數位人格權的要素

歐洲法院適切地將被遺忘權理解為人格權的一部分，從而脫離純粹由資料保護法意義下的評價。因此，若干學者即主張，被遺忘

¹¹⁶ BVerfGE 35, 202 – Urt. v. 5.6.1973 (*Lebach*); BVerfG, Beschl. v. 25.11.1999 - 1 BvR 348/98 und 1 BvR 755/98. 關於其案例事實與憲法法院裁判內容，可參見 *Bumke/Voßkuhle*, *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 2013, Rn. 147ff.; 中文文獻，可參見陳耀祥，論廣播電視中犯罪事實之報導與人格權保障之衝突，載：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131以下，2002年7月。

¹¹⁷ *Buchholtz*, aaO. (Fn. 13), S. 129f.

權實屬線上人格權（Online-Persönlichkeitsrecht）或是線上人格（Online-Persönlichkeit）的下位概念¹¹⁸。蓋雖然搜尋引擎並沒有「創設」出線上人格權，但它提供了一個被壓縮後、任何人均可及的當事人形象的描繪。此即涉及一般人格權的「數位面向」¹¹⁹。如同歐洲法院所認定，網路使用者可透過搜尋引擎藉由輸入姓名就可以獲得該相關人在網路上所得搜尋出的資訊鳥瞰。關於其私生活許多面向的潛在可能性，若沒有搜尋引擎將無法或非常困難地彼此連結，乃至於建立起或多或少詳細的人格剖析。而侵害的效果更透過網路與搜尋引擎而無所不在¹²⁰。因此，歐洲法院所欲防免，透過搜尋引擎所生線上人格剖析（Online-Persönlichkeitsprofile）的危險，即已涉及線上人格權的保護領域¹²¹。

依歐洲法院之見解，藉由歐洲基本權憲章第7條及第8條及資料保護指令作為基礎所導出的被遺忘權，其保護領域的界定應具有兩項要素：個人資料與一定之時間經過。蓋當事人所得要求被遺忘者，必須與其得以連結之資料，始得為之，亦即必須直接或間接個別化之資料¹²²。然學理上不無質疑此一要件得否作為界分個人與非個人資料的明確標準，蓋於當前數據挖掘及類似程式底下，任何

¹¹⁸ Vgl.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10;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53ff.; Luch/Schulz, Das Recht auf Internet als Grundlage der Online-Grundrechte, 2013, S. 41ff. 類似見解，Dörr/Schwartzmann, aaO. (Fn. 92), Rn. 369. 認為，資料的人格權內容作為「數位人格」（digitalisierte Persönlichkeit）乃德國及歐洲資料保護法制的核心。

¹¹⁹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53ff.

¹²⁰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80 = JZ 2014, S. 1015.

¹²¹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46f.; 類似見解，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53.

¹²² Vgl. Art. 2 lit. a Datenschutzrichtlinie 95/46/EG – DSRL; auch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25.

網路上的活動都會留下資料軌跡，在大數據時代下，所有資料與資訊均係個人相關¹²³。惟此一質疑似乎將科技上的發展與法律評價混為一談，保護領域具有劃定保障範圍的功能，同時當事人所得向搜尋引擎業者請求權主張的範圍亦僅限於此，況且前述各該法律基礎皆係以個人資料為保障前提，故此一要件仍有其重要性。

此外由被遺忘權之概念可知，係取決於一定期間經過。只有當一段時間的流逝，該資料既已過時，則「被遺忘」構成要件始具備，始得請求責任人移除該搜尋結果¹²⁴。依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7條規定，個人資料處理必須在整個執行處理期間都是合法的，否則即生刪除請求權¹²⁵，亦即必須在提出搜尋請求時亦屬合法。如前所述，蒐集與儲存該資訊是否合法並非決定被遺忘權之要件，是否造成損害亦在所不問。至於必須要歷經多久的時間，始得要求刪除的問題，事實上此一時間要件正決定了被遺忘權制度事實上能提供範圍多廣的保護。於此，如同許多以時間作為概念要素的法律概念和術語，例如憲法變遷，無法一概而定到底需要多久時間始符合此一要素¹²⁶。但於此可得確定的是其相對關係：倘須歷經的時間越長，則該保護領域越窄；反之，若須歷經的時間越短，則會有更多的資訊受到被遺忘權保護領域所及；該資訊越是私人或私密，則該必要的時間間隔也就越短。此一問題的答案並無法像是數學般明確給定，蓋其所涉各種不同的案例情況與資料類型，實無從給定一致的時間間隔，而必須保有一定的彈性，以便得以在檢視所有情況下

¹²³ *Boehme-Neßler*, aaO. (Fn. 9), S. 827f.

¹²⁴ 若是基於名譽或其他具體人格權或特別祕密保障，例如祕密通訊自由或私密照片等，而請求搜尋引擎業者移除，則非此處被遺忘權所及，自無須時間經過之要件。

¹²⁵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5 = JZ 2014, S. 1016.

¹²⁶ Vgl. *Schenke*, AöR 103 (1978), S. 566 (585ff.)

具體衡量以決定¹²⁷。此一時間要件的認定最後亦屬法院的任務，於個案中進一步具體化。因此，即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所可能涉及的衡量參數及其關聯性。

三、人格權保障與資訊自由間之緊張關係

除了當事人線上人格權保障外，往往亦存在公眾藉由搜尋引擎通往資訊的正當利益，亦即不受妨礙的資訊流通利益，此亦為歐洲法院所肯認¹²⁸。而學理上即已指出，與當事人人格權相衡量者，至少尚有歐洲基本權憲章第11條第1項言論與資訊自由、同條第2項媒體自由以及第16條（搜尋引擎業者的）企業自由¹²⁹。依歐洲法院見解，公眾資訊利益在衡量上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減弱，因此可以說，資訊越過時，那麼公眾的資訊利益必然越不重要，更無法作為與被遺忘的當事人人格權相衡量的因素¹³⁰。個人並無法主張絕對的「資料支配」（*Datenherrschaft*），蓋其係生活於群體之中而開展其人格。德國學者Anika D. Luch/Sönke E. Schulz/Florian Kuhlmann正確指出，若僅謂從該搜尋結果涉及私生活尊重與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亦即開啟保護領域，即導出應保障搜尋結果不予顯示之請求權或刪除權，此一見解並不適當亦非資料保護受基本權保障之目的。事實上，當事人可透過拒絕同意而禁止連結到顯示出

¹²⁷ *Boehme-Neßler*, aaO. (Fn. 9), 828.

¹²⁸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7 = JZ 2014, 1016. 對於衡量標準彼此間的關係，歐洲法院係保持開放。惟學理上有正確批評，認為歐洲法院對此高度價值判斷的衡量模式著墨太少，僅有兩個邊碼（Rn. 97, 98），且對於對立利益與基本權的論述過於簡略，可參見*Arning/Moos/Schefzig*, aaO. (Fn. 64), S. 451ff.

¹²⁹ *Arning/Moos/Schefzig*, aaO. (Fn. 64), S. 451f.

¹³⁰ *Spindler*, aaO. (Fn. 30), S. 988; *Boehme-Neßler*, aaO. (Fn. 9), 829. 認為被遺忘權的構成要件必須是該資訊已過時。

個人之資料，例外情況僅限於由新聞業者對於知名人士所蒐集的資料。然而，網路資料絕大部分是由「一般人」的資料與資訊所組成。若回頭思考資料保護的意義與目的，並不在於絕對權利，而是人格保障的形塑（聯邦資料保護法第1條參照），個人一般人格權係處於共同體關係中社會的一部，而與其他不同自由主體處於緊張關係。人格權並非是一個排斥衡量而絕對保障、不容許限制的法律地位。因此，並不是每個資料處理同時都會構成人格權侵害，其毋寧必須在資料處理的過程於衡量的框架下被積極地確定¹³¹。因此，有必要對於網路上個人資料的流通合法性，衡量個人人格權與公眾資訊流通的公益目的，於具體個案中確定，於此所操作之衡量已不限對於搜尋引擎業者的主張，而毋寧及於原始網頁上的個人資料公布。

在此脈絡下，歐洲法院並未進一步闡述如何操作此一衡量，為了填補此一空缺，因此學理上即建議參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等各級法院實務普遍所採取的衡量立場，即從一般人格權之領域理論（Sphärentheorie）出發，亦即區分私密領域（Intimsphäre）、私人領域（Privatsphäre）與社會領域（Sozialsphäre），應屬可銜接被遺忘權的衡量操作。在國家履行對於個人人格權乃至於個人資料之保護義務，衡量是否應保障人民的刪除請求權或是公眾資訊利益優先時，即可以此領域理論作為權衡模式的起點¹³²。

¹³¹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6;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0.

¹³² Buchholtz, aaO. (Fn. 13), 143ff.; 不同見解，Dietrich Murswiek認為從聯邦憲法法院在人口普查一案所表示「在自動化資料處理的條件下，沒有無關緊要的資料」（unter den Bedingungen der automatischen Datenverarbeitung kein belangloses Datum mehr）可推知，憲法法院於資料保護上係與領域理論保持距離的。參見Murswiek, in: Michael Sachs (Hg.), Grundgesetz, 6. Aufl., 2011,

依德國學者Gabriele Buchholtz依領域理論所導出的權衡模式，首先必須確定當事人所欲刪除的資料係屬何種領域，原則上私密領域或私人領域始列入被刪除之列；反之，當公眾對於社會領域中之個人資料有相應的資訊利益時，原則上公眾的資訊利益優先，當事人必須忍受對其資訊的儲存與處理¹³³。至於該界線劃定，Gabriele Buchholtz引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Spickmich一案中所提出的見解，認為當該資訊流通於網路上會構成「恥辱化、公開羞辱的效應或是社會放逐」（Stigmatisierung, Prangerwirkung oder soziale Ausgrenzung）的情況，即不應再容許其流通¹³⁴。至於領域劃分的標準，並不全然取決於個人主觀認定，而毋寧是在網路公共交流空間中，「社會典型的明顯性」，亦即規範意義上可期待他人之可識

Art. 2 Rn. 106. 但本文認為，此一理解有過度推論之嫌，蓋從人口普查案的論述只能導出，在認定資訊自決權的保護領域時，並不取決於領域理論，但是並不表示，在基本權侵害正當化或衡量階段，不能適用領域理論。況且關於憲法法院所指「沒有無關緊要的資料」一點，Wolfgang Hoffmann-Riem亦正確指出，憲法法院所言並非意指任何一種資料都以同樣的方式被保障，憲法法院只有說，任何一個本身無關緊要的資料視其脈絡都有可能變得重要，例如透過與其他資料相連結及處理的可能性。因此重要的是實用性與利用可能性，而非資料的形式。參見Hoffmann-Riem, aaO. (Fn. 1), S. 530f.

¹³³ 依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係適用禁止原則（Verbotssprinzip），亦即依資料保護法第4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原則上是不許可的，除非有法律授權規定或當事人同意。此一原則適用於公、私領域，僅於同法第28條及第29條對於非公部門之全部禁止有若干鬆綁。參見Buchholtz, aaO. (Fn. 13), S. 132; auch Karg, DuD 2013, S. 75ff.; Schneider, AnwBl 2011, S. 233ff.

¹³⁴ Vgl. BGH, NJW 2009, 2888/2892 = BGH, JZ 19/2009, 961 m. Anm. Ladeur.; auch Gabriele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7. 關於此一裁判，已有諸多文獻分析檢討，可參見Haensle/Reichold, DVBl 2009, S. 1329ff.; Kaiser, NVwZ 2009, S. 1474ff.; Gounalakis/Klein, NJW 2010, S. 566ff.; 關於公開羞辱，可參見Waechter, VerwArch 2001, S. 368ff.

別性與可接受性為標準¹³⁵。除此之外，亦可參考資料保護法上關於「敏感資料」（sensitive Daten, § 3 Abs. 9 BDSG）的界定¹³⁶。尤其必須留意，此一界定須視該資料所處具體脈絡而定，例如於社群網絡中，一般而言由於其個人的上傳散播行為，原本屬私密資訊者即落入私人領域之列，也因此得以衡量決定之。此一脈絡取向的觀察角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以符合網路交流的正當期待¹³⁷。

再者，於第二層次係審查，是否存在當事人有效的同意。若當事人已同意私人對其個人資料之蒐集、傳遞與利用，則該私人領域的干預即應被容忍；反之，若涉及（與人性尊嚴密切連接的）不可侵犯的私密領域，則該同意不具有重要性，蓋此時國家必須防護其人民免於自傷¹³⁸。私密資料並不因儲存方式的變更，例如以類比式或於網路上或社群網絡等方式差別，而使得資料性質由私密領域自動成為私人領域或社會領域，數位面向的私密領域亦受絕對保障¹³⁹。此即資訊自決權中涉及人性尊嚴的部分，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必須禁止觸及個人人格剖析¹⁴⁰。此外，國家亦必須確保並界定當事人有效同意的基礎與要件¹⁴¹。例如當前社群軟體的設計

¹³⁵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7.

¹³⁶ Vgl.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86ff.

¹³⁷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8; 關於社群網絡與資料保護的一般性論述，可參見Spiecker gen. Döhmman, AnwBl 2011, S. 256ff.

¹³⁸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8. 不可諱言地，此一推論係基於德國法上人性尊嚴絕對不可侵犯為出發。

¹³⁹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31. 文中並舉基因分析、測謊器等為例。

¹⁴⁰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34ff.

¹⁴¹ 蓋此涉及藉由同意而構成個人資訊自決權的基本權拋棄，即必須確保同意能力、同意權限、同意聲明及自願性等要求。就此參見Merten, Grundrechtsverzicht, § 73, Rn. 16ff.; 資料保護法上的同意，可參見Bäcker, aaO.

多於一開始即要求使用者選定同意條款始得使用，然此一定型化約款亦必須符合相關法律關於定型化約款控制的要求，且對於經營者所表示的同意亦無法正當化第三人或國家的基本權侵害¹⁴²。當事人必須在充分瞭解其資料將用於何處的基礎上，始該當有效同意的要件，而司法裁判也必須於個案中審查，是否當事人於個人資料揭露前已充分被告知後續的資料處理。

最末，在第三個層次上若無當事人同意且涉及私人領域的資料時，必須與相衝突的利益予以衡量。此一情況是涉及網路被遺忘權最主要的案例類型。於此脈絡，即取決於各該衡量因素於具體個案中的判斷。如Gabriele Buchholtz列舉出下列衡量參數¹⁴³：(一)所涉及之保護法益及資料處理的脈絡，如商業化或社群網路的資料交換；(二)當事人於公眾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如相對或絕對的時代名人標準；(三)當事人的前行為，是否自願將個人資料置於網路；(四)是否具有藉助特殊資訊及其相繼連結可產生人格剖析的危險；(五)是否屬不實的事實陳述，蓋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已被證實為不實的事實陳述並不受到基本權保障¹⁴⁴。就該不實資料所涉及之當事人即可對於原始網頁經營者具有不作為與刪除請求權¹⁴⁵，於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後，亦可對於搜尋引擎業者主張之。

除此之外，德國學者Anika D. Luch/Sönke E. Schulz/Florian

(Fn. 109), S. 105ff.; Menzel, DuD 2008, S. 400ff.; Buchner, DuD 2010, S. 39ff.

¹⁴²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40.

¹⁴³ Buchholtz, aaO. (Fn. 13), S. 149.

¹⁴⁴ BVerfGE 54, 208 (219), E 85, 1 (15) zit. aus Michael/Morlok, Grundrechte, 3. Aufl., 2012, Rn. 210; auch Piroth/Schlink, Staatsrecht II – Grundrechte, 28. Aufl., 2012, Rn. 599; 惟學理上不無有力反對見解，參見Jestaedt, Meinungsfreiheit, § 102 Rn. 36ff.

¹⁴⁵ Glaser, aaO. (Fn. 15), S. 1436.

Kuhlmann亦列舉出若干衡量觀點可適用於網路活動涉及人格權進行衡量之用：1. 依憲法法院裁判，對於「言論表達在侮辱性批評（Schmähkritik）與誹謗（Verleumdung）之間有所區別¹⁴⁶，無關乎是否連結至個人資料。必須留意如此利益衡量的差別，是否會因『資料保護法上的途徑』（datenschutzrechtlicher Ansatz）而被淘空，當事人逕自針對資料處理而非針對（例如侵害名譽之）言論表達」¹⁴⁷；2. 依聯邦憲法法院Lebach案所揭示，「從一般人格權導出『再社會化之權』（Recht auf Resozialisierung），亦即保障免於社會孤立。每一個行為人必須有機會在刑罰制裁後，得以再復歸社會。因此，就新聞報導的公眾利益而言，必須有時間上的限制，以便使得具有再社會化能力的行為人得以重新被納入社會」¹⁴⁸。於此類似的即屬透過搜尋引擎的可被尋找性；3. 「搜尋結果的無所不在以及來自各式各樣來源與生活領域的資訊聚集的情況，由此可得出線上人格的圖象，而這也相應了高度的侵害強度。然而單從搜尋結果的列舉並不必然導出當事人所希望的澄清或改正」¹⁴⁹；4. 從歐洲法院裁判的反面解讀可知，「只要沒有相反的論據，搜尋引擎

¹⁴⁶ 兩者區分實益在於，若屬侮辱性批評者，原則上即屬人格權保障優先於言論自由，蓋其源自於人性尊嚴。然其概念亦不得做過廣解釋，必須限於僅以詆毀個人或人格誣蔑為目的，反之若以對事的爭議為重心，則非屬此概念之列。就此參見Odendahl, in: Bruno Schmidt-Bleibtreu/Hans Hofmann/Hans-Günter Henneke (Hsrg.)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13. Aufl., 2014, Art. 5 Rn. 8. m.w.N.; Jestaedt, aaO. (Fn. 144), Rn. 40, 84.

¹⁴⁷ 參見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6;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1.

¹⁴⁸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1.

¹⁴⁹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1.

的搜尋結果所指引出原始公開（如該原始網頁）之合法性原則上可由原始公開的合法性導出。但是必須就公開本身於例外情況可能（因時間經過而）『轉變為違法』，此時即必須留意該意涵的轉變。然而，若依此即認義務人或新聞檔案紀錄者必須負有持續、主動的審查義務，則又屬延伸過廣，這也同樣適用於搜尋引擎業者」¹⁵⁰，無法期待搜尋引擎業者負有審查義務；5. 反面來說，歐洲法院精確地表示¹⁵¹，「不予顯示之請求權並不取決於因表列於搜尋結果列所可能造成損害的主張，但相反的，雖不以實害為前提，但一項受到威脅的實害或非物質的（聲譽）損害係屬衡量的關鍵要素」¹⁵²；6. 然而在歐洲法院裁判中未能體現的是，線上檔案及其相關的搜尋引擎對於整體社會的功能¹⁵³。如同「未加利用的歷史檔案蒐集不能提供任何價值一般，沒有搜尋引擎的網路同樣沒有用處。不只是將過去發生事件的持續儲存對於資訊自由是核心關鍵，就其可被尋找性同樣也屬於此」¹⁵⁴；7. 最後，「時間間隔、當事人有所變動的個人生活情況（例如變性後）、從公眾生活中退隱的名人、或是該重要資料係由當事人本身置於網路等情況」¹⁵⁵，都必須於衡量中予以考量。

¹⁵⁰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1.

¹⁵¹ EuGH, Urt. v. 13.5.2014 – C-131/12, Rn. 96 = JZ 2014, 1016.

¹⁵²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1.

¹⁵³ 就此可參見Mann, aaO. (Fn. 36), S. 133ff.; Mann, AfP 2014, S. 210ff.; Ruttig, aaO. (Fn. 73), S. 372ff.

¹⁵⁴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2.

¹⁵⁵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S. 707; auch Hoffmann/Luch/Schulz/Borchers, aaO. (Fn. 17), S. 62.

於此，國家為履行對於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的保護義務，也必須兼顧各方利益作出實踐和諧意義下的最適衡量，前述所提出的衡量因素適可作為具體化法益衡量的參數。正如歐洲法院所審理的西班牙案例事實中該原始網頁並非違法公布個人資料，而是合法公布。因此，如何衡量新聞自由、資訊流通自由與個人人格權保障間的各別利益，不致於使得新聞業者過度自我審查，避免日後負擔責任的風險或是造成所謂網路封鎖（sogenannte Netzsperr）的危險，則是必須由立法者與執行機關共同具體化此一基本權保護義務¹⁵⁶。

肆、資料保護法的具體化

在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後，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內國法中如何具體化此一裁判意旨。德國學者Anika D. Luch/Sönke E. Schulz/Florian Kuhlmann即指出，歐盟法院的裁判見解可直接嵌入德國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中。例如對於搜尋引擎所蒐集個人資料可適用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項第1句第2款、第3款以及（或）第29條；對於後續傳遞予網路使用者可適用同法第28條第2項以及（或）第29條¹⁵⁷，而個人對於搜尋引擎業者所主張之請求權，係於同法第35條規範。在檢視德國資料保護法制後，擬進一步審視在我國現行法制下，是否亦能提供如同本件歐盟法院被遺忘權相似的

¹⁵⁶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S. 165. 類似見解，Herzog, Vorwort, S. 6. 關於本件裁判對於媒體法的影響，可參見von Lewinski, aaO. (Fn. 70), S. 1ff.

¹⁵⁷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4. 然而文中主張，搜尋結果列不予顯示的請求權可從同法第20條導出。但第20條係處理國家部門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規範，類似規定但針對非公務機關係規定在同法第35條，就此似有誤會。

保障機制。

一、德國資料保護法第35條之適用

依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12條第b款規定，當該資料處理不符合指令規定的要求，特別是該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unvollständig oder unrichtig*），即賦予當事人相應的更正、刪除或限制資料之請求權（*Recht auf Berichtigung, Löschung und Sperrung von Daten*）。此一解消義務並不取決於當事人提出要求，亦不取決於該資料如何被蒐集，亦即不論該資料是否由當事人所告知、或由責任人所傳遞，抑或由公開資料所蒐集。此一歐盟指令規定的解消義務與請求權則轉換為德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2項（針對公部門的資料處理）、第35條第2項第2句（針對私部門的資料處理）¹⁵⁸，於此相關的是第35條的規範。而德國資料保護法雖無明確之「被遺忘權」明文，但於私部門之資料保護規範依同法第35條有更正、刪除或限制資料之請求權（*Recht auf Berichtigung, Löschung und Sperrung von Daten*）可資適用¹⁵⁹。其中同條第1項規定，當該個人資料不正確時，當事人有更正請求權；同條第2項則規定刪除請求權。所謂「刪除」係指使該個人資料無從辨認者（*Unkenntlichmachen*，同法第3條第4項第5款）。第35條第2項第1句確立刪除於任何時間原則上皆屬合法，除非有同條第3項第1款、第2款限制事由。第2項第2句首先規範，資料儲存係不合法、或屬敏感性資料，抑或該資料之知悉已不再為儲存目的所必要時，即可

¹⁵⁸ *Hornung/Hofmann*, aaO. (Fn. 28), 166.

¹⁵⁹ 以下關於德國資料保護法規定的說明，參見 *Kühling/Seidel/Sivridis*, aaO. (Fn. 42), S. 193ff.; 較為深入者，參見 *Brink*, in: *Heinrich Amadeus Wolff/Stefan Brink* (Hg.), *Datenschutz in Bund und Ländern*, 2013, § 35; *Dix*, in: *Spiros Simitis* (Hg.),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7. Aufl., 2011, § 35.

將該資料刪除。於第2句第4款規定，當該個人資料係為商業傳輸目的而被處理，且經審查該資料長期儲存並無必要時，賦予當事人有刪除請求權。此一構成要件於社群媒體範圍中亦甚有助益，蓋於社群網路業務之一即在於資料處理，並將其「移轉」至使用者。若當事人要求服務提供者刪除時，該資料繼續儲存之必要性即不復存在¹⁶⁰。

此外，依同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該個人資料原應被刪除，但依同條第3項規定，符合特定情形下，得例外不予刪除，而僅限制其進一步被處理或利用（參照同法第3條第4項第4款限制之立法定義）：包括(一)法律、規章或契約規範有資料保存期限而不許立即刪除；或(二)刪除對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造成危害（如該資料為當事人於訴訟中舉證資料）；抑或(三)系爭資料因儲存方式特殊，無法刪除或刪除需耗費顯不合比例的成本。再者，德國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4項亦規定個人資料之限制，「只要當事人爭執其資料正當性，而無法確定其正確與否」，亦即真偽不明的情況（Non liquet-Fälle），此一請求權基礎亦提供被遺忘權一定助益¹⁶¹。

最後，即便該資料係合法蒐集、處理與利用，同法第35條第5項仍賦予當事人異議權¹⁶²。亦即經當事人異議並經審查確認，在其本身特殊情況下，其值得保護的利益優於該非公務機關所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利益時，該非公務機關之責任人即應停止上開行為。蓋當事人對於資料最為切身相關，於個案中若有人格權或其利益遭受重大侵害之可能，最能夠即時反應提出異議，此時該責任人則須衡量雙方利益以判斷之。若認定當事人利益優先者，則應刪除

¹⁶⁰ Nolte, aaO. (Fn. 26), S. 238; Buchholtz, aaO. (Fn. 13), S. 132.

¹⁶¹ Buchholtz, aaO. (Fn. 13), S. 132f.; Nolte, aaO. (Fn. 60), S. 2241.

¹⁶² 此項規定係轉換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14條第a款事由而來。

該資料¹⁶³。若該責任人係基於法規所課予義務而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者，則該異議權並不適用（同項第2句）。就此規定，德國迄今的學理及實務見解相較於歐洲法院在解釋上仍屬較窄。在歐洲法院裁判後，可能會有質疑，此一要件是否符合歐盟指令的要求。因此解釋上，第5項的「本身特殊情況」即可依「取向於歐洲法解釋」原則或「符合指令之法續造」而參酌歐洲法院裁判立場¹⁶⁴，予以認定。因此對於一般人而言，通常在一定期間經過後，當事人利益多優先於公眾利益，而衡量因素亦可參酌歐洲法院所提出之衡量標準決定之¹⁶⁵。

二、執行層面

就實際執行層面而言，如何落實執行仍有其障礙，蓋逐案判斷對於網路事件有其困難¹⁶⁶。因此，可以參照的是，類似於訊息儲存服務提供者（Host-Provider）對於違法內容的責任以及關於著作權及商標權侵害的「通知與移除程序」原則（Notice-and-take-down-Prinzip），當事人必須先擬具刪除要求，並以最低限度範圍內提出具體事證，藉此搜尋引擎業者始有可能進行利益衡量，以決定是否移除搜尋結果¹⁶⁷。目前歐洲法院判決所影響的有效範圍僅限於歐洲，所以在歐洲使用Google搜尋個人姓名時，下方常出現這樣一排斜體字樣：「我們依據歐盟資料保護法的規定移除了部分搜尋結果」。

¹⁶³ Nolte, aaO. (Fn. 60), S. 2241; Buchholtz, aaO. (Fn. 13), S. 133.

¹⁶⁴ 一般性說明，參見Hainthaler, ZJS 2015, S. 13ff.

¹⁶⁵ Nolte, aaO. (Fn. 60), S. 2241.

¹⁶⁶ 執行層面的疑慮，可參見Spiecker gen. Döhmman, KritV 2014, S. 28ff.; 技術上實現可能性Jandt/Kieselmann/Wacker, DuD 4/2013, 235-241.

¹⁶⁷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09.

依德國學者的建議，當事人應盡可能貼近裁判用語與其法律上依據。若其主張個人資格的不正確性，他應該提出書面證明資料，例如法院裁判、機關決定、不作為聲明、原始網頁或編輯者的自白或供述，以便得其陳述可信且可追溯其依據。若主張德國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5項的異議權（*Widerspruchsrecht*），應詳細說明該待解消資訊的時效以及對於人格權侵害的嚴重性為其重點。就此例如對其職業或對於營業活動執行的不利益、以及該資訊所涉及當事人私領域甚至是私密領域¹⁶⁸。當搜尋引擎業者不履行該當事人所提的有理由的刪除申請時，當事人可依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8條第6項尋求有權監督機關，通常係邦資料保護監察人（*Landesdatenschutz-beauftragte*）為之，監督機關可下令排除違法（§ 38 Abs. 5 BDSG）。若該責任人仍不作為、或是繼續蒐集或處理該應解消之資料時，例如搜尋引擎業者違反相應的刪除請求，在個人利益高於公眾利益情況下，仍於搜尋結果中予以顯示而構成處理個人資料者，則可能構成同法第43條第2項第1款之違反秩序罰甚至是第44條第2項由檢察官追訴之刑事制裁。¹⁶⁹

三、借鏡歐洲法院與德國學理，評釋我國法院被遺忘權裁判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可能的繼受途徑

由前述可知，歐洲法院被遺忘權裁判可謂是歐洲法上個人人格權與資料保護的里程碑裁判¹⁷⁰，所造成後續影響目前暫時還無法斷定，不過此一裁判可以說是試圖在數位記憶或遺忘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的嘗試。如前所述，網路時代下出於各種原因，無論是一般人

¹⁶⁸ *Nolte*, aaO. (Fn. 60), S. 2238 (2241f.).

¹⁶⁹ *Nolte*, aaO. (Fn. 60), S. 2242; *Karg*, aaO. (Fn. 51), S. 360.

¹⁷⁰ Vgl. *Karg*, aaO. (Fn. 51), S. 361; *Nolte*, aaO. (Fn. 60), S. 2238.

民因錯誤新聞報導而成為非自願的公眾人物、抑或只是一時年少輕狂使得個人資訊流傳於網路中，人們都應該有著被遺忘的期待與重新出發的機會。憲法上保障個人人格自由開展，對於數位社會中因搜尋引擎興起而造成對於人格深遠的影響，亦應有所回應。就此亦屬本文介紹歐洲法院裁判之目的所在。然而，關於如何將此一裁判意旨落實於內國法，甚至為我國法院所參考繼受，仍不無疑問。以下即針對我國臺北地院一〇三年度訴字第二九七六號暨臺灣高等法院一〇四年度上字第三八九號兩則判決做一簡要評釋，進而檢討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上「可否」以及「如何」引入被遺忘權之概念，以填補我國資料保護法制上可能的漏洞。

(一)臺北地院暨臺灣高等法院被遺忘權判決見解

由前述關於臺北地院審理過程可知，案件爭點實與歐洲法院Google訴西班牙一案雷同。差別主要在於，我國案例中係以侵權行為和消費者保護法主張之，而歐洲法院則是集中於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臺北地院駁回理由主要有兩點：Google臺灣分公司並非侵權行為主體，且消費者保護法保護法益未及於名譽權及隱私權；而臺灣高等法院駁回理由則係認定被上訴人無法證明Google臺灣分公司係執掌搜尋引擎業務、擁有管理搜尋引擎權限之企業，因此駁回原告上訴。

就高等法院之上訴部分，上訴人已追加個人資料保護法作為請求權基礎。但高等法院判決之核心見解認定：「系爭搜尋引擎與關鍵字廣告乃兩種不同之服務」，據此判定Google臺灣分公司對於系爭搜尋引擎並無管理及維護之權能，因此實體上是否存在被遺忘權——亦即得請求被上訴人移除上開搜尋結果及搜尋建議關鍵字之權利，即置而不論。相較之下，就責任人認定而言，歐洲法院係從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出發，認定歐盟相關資料保護規範亦適用於總部設

於美國之Google公司，搜尋引擎業者之西班牙分公司亦構成資料保護法上的責任人，歐盟資料保護指令之地域適用範圍亦及於此。依此，歐洲法院相關認定理由實可作為我國法院審理所參酌，而不應以跨國企業的內部分工為由，逕拒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適用，特別是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4條第1項第a款並未要求該資料處理係「由」所涉及之分公司本身為之，而僅要求「在其業務範圍」即可。依此，歐洲法院認定搜尋引擎服務雖由位於第三國之事業總部所執行，但該總部於歐盟會員國境內設有子公司，而該子公司係為使該搜尋引擎所提供服務以獲利，而在該會員國境內進行廣告活動，故該個人資料處理係被認定屬該子公司之業務範圍之內。

然而，此一高院見解其實無異於先前臺北地院之見解，而僅從形式認定Google臺灣分公司不具被告適格，而駁回原告（上訴人）之訴。惟此一認定似有違誤，蓋相較於歐洲法院之判決，由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之立法目的出發，認為指令係為提供個人於資料處理時，一項有效且全面之保障，因此該適用範圍不應從嚴解釋，以避免各跨國企業藉由巧妙選定事業體位置的策略，而規避歐盟資料保護之要求。以此若進一步參酌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8款非公務機關之立法定義，係指非公務機關：指非行使公權力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並未設有母公司與子公司責任分離之規定，Google臺灣分公司自應作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上之責任人。由此以觀，我國兩則法院判決對此嚴格切割兩者責任，反而喪失宣示我國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無漏洞之決定，實屬令人遺憾之裁判。

（二）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中之請求權基礎探求

其次，臺北地院判決中原告並未主張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請求權基礎，在該案中原告係以侵權行為和消保法為由主張，就必須面對侵權行為構成要件是否該當的問題，亦即被告是否有加害行為，

並且具有故意或過失、原告是否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加害行為和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等要件¹⁷¹。此衡諸搜尋引擎業者之行為，其資料處理係透過蒐集、組織各該在網路上既已公開之資訊，而不問各別原始資訊是否合法，單就搜尋引擎業者之行為而論，是否構成民法侵權行為或民法人格權保障之相關要件，法院並未表示見解；反之，法院僅就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予以審查、駁斥，就此實屬理由不備。

對照來看，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於二〇一〇年公布全文修正，修正過程中亦大幅參酌一九九五年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¹⁷²。而歐洲法院裁判見解認為可由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導出被遺忘權，則就解釋論上我國法是否亦得繼受此一見解，實不無再思量之必要。若參酌歐洲法院之見解，被遺忘權之構成要件並不問當事人有無損害或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就此已有別於民法侵權行為之要件；以制度目的出發，資料保護法制乃以「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為其立法目的，應可提供針對網路上因搜尋引擎而擴大不實或過時之資料影響力的救濟，而無庸援引消費者保護法作為請求權基礎。因此，原審裁判中當事人未能考量到原始網頁與搜尋引擎的差別，以及網路上資料流通的特質，逕以未必適合的侵權行為或消保法作為請求權基礎，似甚難獲致有效之權利救濟。但二審中上訴人已追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1項至第4項為請求權基礎，至此即應檢視此一請求權基礎是否該當。

我國學界對於被遺忘權之證立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上請求權之探

¹⁷¹ 從裁判觀之，原告除了未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作為請求權基礎，似亦未主張民法第18條請求除去人格權侵害之請求權。

¹⁷² 可參見劉靜怡，同註98，頁152以下。

求，並未形成一致之見解，但似多（援引英文文獻而）傾向於保守見解。如劉靜怡教授在臉書社群網路的脈絡中討論被遺忘權，而認為「被遺忘權只是強化使用者控制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及資料刪除與否的權能，但是卻無法直接改變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及隱私法制，囿於既有的公私領域區分、公開與非公開區分的對立結構，對於社群網站上屢見不鮮的個人資料在不同情境脈絡間互相流動的現象，無法有效提供保護的闕漏」¹⁷³。類此意見，如許炳華檢察事務官撰文指出：「實務上，立法層面雖有前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制定，然歸納言之，網路上流通之『不屬於個資法上個人資料定義之資料』、『無個資法適用之個人資料』、『非儲存於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之個人資料』，皆不在當事人刪除權之範圍，蒐集、處理或利用存在於公開場所個人資料，當事人同樣不能主張刪除」¹⁷⁴。惟甚為可惜的是，上述兩篇專文雖均提及被遺忘權，並未具體指明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是否可導出此一請求權基礎。另徐彪豪先生亦有提及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亦設有「請求刪除與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權利」，亦得作為「去列表權的請求權基礎之用」¹⁷⁵，惟同段文字卻又提到以下難解之論述：「惟依據同法第11條第3項之規範，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論者或認為若以此條限縮解釋第3條之

¹⁷³ 劉靜怡，社群網路時代的隱私困境：以Facebook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1卷1期，頁46，2012年3月。惟該文中僅認為依我國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極可能被認定屬於已經公開的個人資料，對於是否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請求刪除一事，並未具體指明。

¹⁷⁴ 許炳華，被遺忘的權利：比較法之觀察，東吳法律學報，27卷1期，頁146，2015年7月。

¹⁷⁵ 徐彪豪，同註43，頁68以下。

適用，則會得出該條不得作為去列表申請基礎之結論」（頁69）。有別於此，楊智傑教授則明確主張可援引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同條第2項作為被遺忘權之請求權基礎¹⁷⁶。其論據主要在於這兩條規定係賦予當事人「請求權」或「反對權」，且從該條立法理由可知，修法時係參考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規定，因此可作為被遺忘權於個資法上之請求權基礎¹⁷⁷。

惟查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規定，體系上係「非公務機關或公企業之資料處理」一章中，為規範「為履行自身業務目的為由之資料處理」（§ 28 Datenerhebung und -speicherung für eigene Geschäftszwecke）之條文，該條並非旨在賦予當事人個人資料保護法上之各項權利；相較於此，誠如前述關於德國資料保護法的分析，該法第20條及第35條之規定係由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第12條轉換而來，本身即為針對公部門之資料處理或私部門之資料處理的構成要件。德國學者即已指明，就搜尋引擎業者所為之被遺忘權，即可適用針對私部門之第35條作為被遺忘權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中之請求權基礎（詳參前述肆、一）。而對照我國與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即類似德國資料保護法第20條及第35條之規定，亦可分為「更正或補充請求權」（同條第1項，類似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1項之更正）、「停止處理或利用請求權」（同條第2項，類似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4

¹⁷⁶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同條第2項：「(I)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II)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7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¹⁷⁷ 楊智傑，同註54，頁38以下。

項之限制），尤其是第3款「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請求權，與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5條第2項、第3項及第5項若符合符節，應可作為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中導入被遺忘權之請求權基礎¹⁷⁸。

伍、結論與展望

從上述討論也可以發現，目前關於個人資料的法制定、法適用與法院裁判正處於過渡期間。個人資料不僅是人格的一部分，甚至有學者認為應承認個人的資料主權（*Datensouveränität*）¹⁷⁹、資料高權（*Datenhoheit*）¹⁸⁰、個人資料的貨幣化（*Monetarisierung von personenbezogenen Daten*）¹⁸¹。其中貨幣化的趨勢可以從在所謂免費的社群網路的使用條件中，必須提供個人資料以作為對待給付的契約內涵中窺知一二。迄今將一方面是社群網路使用視為免費的服務提供；另一方面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當事人同意的觀察方式，已

¹⁷⁸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規定：「(I)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II)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III)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IV)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V)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¹⁷⁹ *Seidel*, ZG 2014, S. 153ff.

¹⁸⁰ *Bosesky/Hoffmann/Schulz*, DuD 2013, S. 95ff.

¹⁸¹ *Bräutigam*, MMR 2012, S. 635 (640f.).

無法妥適說明現實狀態¹⁸²。在歐盟理事會嚴格執行資料保護基本權的背景下，在歐洲已有倡議依個人資料保護基本命令（草案）規定，企業故意或過失未能維護消費者權益，更正或刪除消費者資料，違反該命令所保障之消費者「被遺忘權」者，裁處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總年營業額1%罰鍰¹⁸³，足見被遺忘權制度已不僅是歐洲法院的裁判見解，更是歐洲立法、行政及學理發展的一部分。

然而，倡議被遺忘權不應該使得新聞自由或資訊流通受到不必要的障礙，利益衡量若過度倒向人格權保障，是否會產生若干企業、商家乃至於公眾人物有目的地更改搜尋引擎上的連結，隱惡揚善，而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形象，亦有待觀察。當人們享有網路所帶來的便利時，究竟得容忍多少個人資訊被網路所記憶，何者又必須被遺忘，必須在具體個案適用中，在私領域與公眾、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找到得以接受的容許風險¹⁸⁴。此一歐洲法院裁判深化了歐洲法上資料保護，也釐清某些要件上的疑義，但同時也帶來一連串的問題，對於具體法益衡量保持開放下，仍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衡量參數的開展。被遺忘權裁判只是網路上確保人格權保障的起點，無論如何至少應該給予個人有被遺忘的機會，一項重新劃定公與私的界線的可能性。

¹⁸² 因此，有認為在法學上應將此一利用關係理解為具有對價的交換關係來理解，在其中個人資料係作為商業利益的對價關係來呈現。就此參見 *Luch/Schulz/Kuhlmann*, aaO. (Fn. 3), 715; *Bräutigam*, aaO., S. 640f.

¹⁸³ 參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法律要聞：<https://stli.iii.org.tw/ContentPage.aspx?i=6902>，最後瀏覽日：2015年6月30日。

¹⁸⁴ 更有甚者，在當前「轉型正義」的討論甚多，要求公開歷史檔案，釐清責任以求和解等訴求，亦多標舉「記憶或遺忘」的選擇。惟此一訴求在法律層面上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脈絡，主要係關乎國家所掌資料之保存與提供等問題，與此處論文標題「記憶或遺忘，抑或相忘於網路」一事，係指私領域之個人資料重心有別，於此特予說明。

參考文獻

一、中 文

1. 李震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回顧與前瞻，中正法學集刊，14期，頁35-82，2004年1月。
2. 李震山，公權力運用定位科技措施與基本權利保障，載：二十一世紀公法學的新課題——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頁335-365，2008年10月。
3. 邱文聰，從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概念區分——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的結構性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68期，頁172-189，2009年5月。
4. 徐彪豪，被遺忘權近期發展——歐盟法院判決週年後回顧與本土觀察，科技法律透析，27卷1期，頁50-70，2015年11月。
5. 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2001年1月。
6. 許炳華，被遺忘的權利：比較法之觀察，東吳法律學報，27卷1期，頁125-163，2015年7月。
7. 陳靜慧，歐盟法院之組織與功能，載：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頁101-150，2015年7月。
8. 陳耀祥，論廣播電視中犯罪事實之報導與人格權保障之衝突，載：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115-142，2002年7月。
9. 黃昭元，無指紋則無身分證？換發國民身分證與強制全民捺指紋的憲法爭議分析，載：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461-508，2005年9月。
10. 楊智傑，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上「被遺忘權利」與「個人反對權」：從2014年西班牙Google v. AEPD案判決出發，國會月刊，43卷7期，頁19-43，2015年7月。
11. 詹鎮榮，基本權各論基礎講座(5)——秘密通訊自由，法學講座，21期，頁1-15，2003年9月。
12. 劉靜怡，不算進步的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初步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83期，頁147-164，2010年8月。

13. 劉靜怡，社群網路時代的隱私困境：以Facebook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1卷1期，頁1-70，2012年3月。

二、外 文

1. *Albers, Marion*, Umgang mit personenbezogenen Informationen und Daten, in: *Hoffmann-Riem, Wolfgang/Schmidt-Aßmann, Eberhard/Voßkuhle, Andreas* (Hg.), *GVwR* Bd. II, 2012, § 22, S. 107ff.
2. *Albers, Marion*, Datenschutzrecht, in: *Ehlers, Dirk/Fehling, Michael/Pünder, Hermann* (H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Bd. 2, 2013, § 62, S. 1148ff.
3. *Arning, Marian/Moos, Flemming/Schefzig, Jens*, Vergiss(,) Europa! - Ein Kommentar zu EuGH, Urt. v. 13.5.2014 – Rs. C-131/12 – Google/Mario Costeja Gonzalez, CR 2014, S. 447ff.
4. *Bäcker, Matthias*, Die Vertraulichkeit der Internetkommunikation, in: *Rensen, Hartmut/Brink, Stefan* (Hg.), *Linie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 erörtert von den wissenschaftlichen Mitarbeitern*, 2009, S. 99ff.
5. *Bäcker, Matthias*, Grundrechtlicher Informationsschutz gegen Private, *Der Staat* 2012, S. 91ff.
6. *Boehme-Neßler, Volker*, Das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 Ein neues Internet-Grundrecht im Europäischen Recht, *NVwZ* 2014, S. 825ff.
7. *Bosesky, Pino/Hoffmann, Christian/Schulz, Sönke E.*, Datenhoheit im Cloud-Umfeld, *DuD* 2013, S. 95ff.
8. *Bräutigam, Peter*, Das Nutzungsverhältnis bei sozialen Netzwerken - Zivilrechtlicher Austausch von IT-Leistung gegen personenbezogene Daten, *MMR* 2012, S. 635ff.
9. *Brink, Stefan*, in: *Wolff, Heinrich Amadeus/Brink, Stefan* (Hg.), *Datenschutz in Bund und Ländern*, 2013.
10. *Britz, Gabriele*, Europäisierung des grundrechtlichen Datenschutzes?, *EuGRZ* 2009, S. 1ff.
11. *Buchholtz, Gabriele*, Das „Recht auf Vergessen“ im Internet – eine

- Herausforderung für den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AöR 140 (2015), S. 121ff.
12. *Buchner, Benedikt*, Die Einwilligung im Datenschutzrecht, DuD 2010, S. 39ff.
13. *Bull, Hans Peter*, Zweifelsfragen um die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NJW 2006, S. 1617ff.
14. *Bull, Hans Peter*, Persönlichkeitsschutz im Internet: Reformeifer mit neuen Ansätzen, NVwZ 2011, S. 257ff.
15. *Bumke, Christian/Voßkuhle, Andreas*, 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 2013.
16. *Dix, Alexander*, in: *Simitis, Spiros* (Hg.),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7. Aufl., 2011.
17. *Dörr, Dieter/Schwartmann, Rolf*, Medienrecht, 5. Aufl., 2015.
18. *Eifert, Martin*, Freie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in sozialen Netzen – Rechtlicher Schutz von Voraussetzungen und gegen Gefährdungen der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im Web2.0, in: *Bieber, Christoph/Eifert, Martin/Groß, Thomas/Lamla, Jörn* (Hg.), Soziale Netze in der digitalen Welt, 2009, S. 253ff.
19. *Epping, Volker*, Grundrechte, 6. Aufl., 2014.
20. *Federrath, Hannes/Fuchs, Karl-Peter/Herrmann, Dominik/Maier, Daniel/Scheuer, Florian/Wagner, Kai*, Grenzen des digitalen Radiergummi, DuD 2011, S. 403ff.
21. *Glaser, Andreas*, Grundrechtlicher Schutz der Ehre im Internetzeitalter, NVwZ 2012, S. 1432ff.
22. *Gounalakis, Georgios/Klein, Catherine*, Zulässigkeit von personenbezogenen Bewertungsplattformen - Die „Spickmich“-Entscheidung des BGH vom 23.6. 2009, NJW 2010, S. 566ff.
23. *Gounalakis, Georgios*, Rechtliche Grenzen der Autocomplete-Funktion von Google, NJW 2013, S. 2321ff.
24. *Greve, Holger*, Drittwirkung des grundrechtlichen Datenschutzes im digitalen Zeitalter, in: Festschrift für Michael Kloepper, 2013, S. 665ff.
25. *Grimm, Dieter*, Der Datenschutz vor einer Neuorientierung, JZ 2013, S. 585ff.
26. *Grimm, Rüdiger*, Spuren im Netz, DuD 2012, S. 88ff.
27. *Gstrein, Oskar Josef*, Die umfassende Verfügungsbefugnis über die eigenen Daten - Das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und seine konkrete Umsetzbarkeit, ZD 2012, S. 424ff.

28. *Haensle, Walter/Reichold, Rahel*, Anmerkung zum Urteil des BGH vom 23.6. 2009, DVBI 2009, S. 1329ff.
29. *Hainthaler, Claudia*, Die richtlinienkonforme Rechtsfortbildung im dreistufigen System der Richtlinienwirkungen, ZJS 2015, S. 13ff.
30. *Heckmann, Dirk*, Persönlichkeitsschutz im Internet – Anonymität der IT-Nutzung und permanente Datenverknüpfung als Herausforderungen für Ehrschutz und Profilschutz, NJW 2012, S. 2631ff.
31. *Herzog, Roman*, Geleitwort, in: *Schliesky, Utz/Hoffmann, Christian/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Borchers, Kim Corinna*, Schutzpflichten und Drittwirkung im Internet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Roman Herzog, 2014, S. 5ff.
32. *Herzog, Roman*, Vorwort, in: *Hoffmann, Christian/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Borchers, Kim Corinna*, Die digitale Dimension der Grundrechte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5, 5ff.
33. *Hoeren, Thomas*, Und der Amerikaner wundert sich ...– Das Google-Urteil des EuGH, ZD 2014, S. 325ff.
34. *Hoffmann, Christian/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Borchers, Kim Corinna*, Die digitale Dimension der Grundrechte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5.
35. *Hoffmann-Riem, Wolfgang*,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 Auf dem Wege zu einem neuen Konzept des Datenschutzes, AöR 123 (1998), S. 513ff.
36. *Hoffmann-Riem, Wolfgang*, 1984 oder 2004 – Datenschutz im Zeichen der wachsenden Gefährdung durch Private, in: *Hoffmann-Riem, Wolfgang* (Hg.), Modernisierung von Recht und Justiz – Eine Herausforderung des Gewährleistungsstaates, 2001, S. 153ff.
37. *Hornung, Gerrit/Hofmann, Kai*, Ein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eines neuen Datenschutzrechts, JZ 2013, S. 163ff.
38. *Hornung, Gerrit*, Datenschutzrechtliche Aspekte der Social Media, in: *Hornung, Gerrit/Müller-Terpitz, Ralf*, Rechtshandbuch Social Media, 2015, Kap. 4, S. 79ff.

39. *Jandt, Silke/Kieselmann, Olga/Wacker, Arno*, Recht auf Vergessen im Internet – Diskrepanz zwischen rechtlicher Zielsetzung und technischer Realisierbarkeit?, DuD 4/2013, S. 235ff.
40. *Jarass, Hans D.*, Die Grundrechte: Abwehrrechte und objektive Grundsatznormen, in: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1, Bd. 2, S. 35ff.
41. *Jarass, Hans D.*,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2. Aufl., 2013.
42. *Jestaedt, Matthias*, Meinungsfreiheit, in: *Merten, Detlef/Papier, Hans-Jürgen* (H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Bd. IV, 2011, § 102, S. 875ff.
43. *Kaiser, Anna-Bettina*, Bewertungsportale im Internet – Die spickmich-Entscheidung des BGH, NVwZ 2009, S. 1474ff.
44. *Kalabis, Lukas/Selzer, Annika*, Das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nach der geplanten EU-Verordnung, DuD 2012, S. 670ff.
45. *Karg, Moritz*, Die Renaissance des Verbotsprinzips, DuD 2013, S. 75ff.
46. *Karg, Moritz*, Anmerkung für EuGH, Lösungsanspruch gegen Google – Recht auf Vergessen, ZD 2014, S. 359ff.
47. *Kloepfer, Michael/Schärdel, Florian*, Grundrechte für die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 Datenschutz und Informationszugangsfreiheit ins Grundgesetz, JZ 2009, S. 453ff.
48. *Kodde, Claudia*, Die „Pflicht zu Vergessen“ –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und Löschung in BDSG und DS-GVO, ZD 2013, S. 115ff.
49. *Koreng, Ansgar/Feldmann, Thorsten*, Das „Recht auf Vergessen“ – Überlegungen zum Konflikt zwischen Datenschutz und Meinungsfreiheit, ZD 2012, S. 311ff.
50. *Kühling, Jürgen/Seidel, Christian/Sivridis, Anastasios*, Datenschutzrecht, 2. Aufl., 2011.
51. *Kühling, Jürgen/Klar, Manuel*, Unsicherheitsfaktor Datenschutzrecht – Das Beispiel des Personenbezugs und der Anonymität, NJW 2013, S. 3611ff.
52. *Ladeur, Karl-Hainz*, Schutzpflicht gegenüber privaten Gefährdungen, in: *Götting, Horst-Peter/Schertz, Christian/Seitz, Walter* (Hg.), Handbuch des Persönlichkeitsrechts, 2008, § 9, S. 165ff.
53. *Ladeur, Karl-Heinz/Gostomzyk, Tobias*, Der Schutz von Persönlichkeitsrechten gegen Meinungsäußerungen in Blogs – Geht die große Zeit des privaten

- Presserechts im Internet zu Ende?, NJW 2012, S. 710ff.
54. Lang, Markus, Google Search und das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K & R 2014, S. 449ff.
55. Lenz, Sebastian/Leydecker, Philipp, Privatrecht als Freiheitsordnung – Die Bindungen der Staatsgewalt bei der Schaffung und Anwendung von Privatrecht im Licht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VerfG, ZG 2006, S. 407ff.
56. 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 Das Recht auf Internet als Grundlage der Online-Grundrechte, 2013.
57. 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Kuhlmann, Florian, Ein Recht aus Vergessenwerden als Ausprägung einer selbstbestimmten digitalen Persönlichkeit – Anmerkung zum Urteil des EuGH v. 13.5.2014 (Google), Rs. C-131/12, EuR 2014, S. 698ff.
58. Mann, Roger, Muss das Internet Vergessen lernen?, in: Leible, Stefan/Kutschke, Torsten (Hg.), Der Schutz der Persönlichkeit im Internet, 2013, S. 133ff.
59. Mann, Roger, Online-Archive nach der Google-Entscheidung des EuGH, AfP 2014, S. 210ff.
60. Masing, Johannes, Herausforderungen des Datenschutzes, NJW 2012, S. 2305ff.
61. Martini, Mario, 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 im Spiegel der jüngeren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JA 2009, S. 839ff.
62. Mayer-Schönberger, Viktor, Delete – Die Tugend des Vergessens in digitalen Zeiten, 2. Aufl., 2011.
63. Menzel, Hans-Joachim, Datenschutzrechtliche Einwilligungen, DuD 2008, S. 400ff.
64. Merten, Detlef, Grundrechtsverzicht, in: Merten, Detlef/Papier, Hans-Jürgen (H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Bd. III, 2009, § 73, S. 717ff.
65. Michael, Lothar/Morlok, Martin, Grundrechte, 3. Aufl., 2012.
66. Milstein, Alexander/Lippold, Matthias, Suchmaschinenresultate im Lichte der Meinungsfreiheit der nationalen und europäischen Grund- und Menschenrechte, NVwZ 2013, S. 182ff.
67. Murswiek, Dietrich, in: Sachs, Michael (Hg.), Grundgesetz, 6. Aufl., 2011.

68. *Nolte, Norbert*, Zum Recht auf Vergessen im Internet, ZRP 2011, S. 236ff.
69. *Nolte, Norbert*, Das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 mehr als nur ein Hype?, NJW 2014, S. 2238ff.
70. *Odendahl, Kerstin*, in: *Schmidt-Bleibtreu, Bruno/Hofmann, Hans/Henneke, Hans-Günter* (Hsrg.),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13. Aufl., 2014.
71. *Oeter, Stefan*,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und die Autonomie des Privatrechts, AöR 119 (1994), S. 529ff.
72. *Papier, Hans-Jürgen*,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in: *Papier, Hans-Jürgen/Merten, Detlef* (H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Bd. 2, 2006, § 55, S. 1331ff.
73. *Paschke, Marian*, Medienrecht, 3. Aufl., 2009.
74. *Pieroth, Bodo/Schlink, Bernhard*, Staatsrecht II – Grundrechte, 28. Aufl., 2012.
75. *Piltz, Carlo*, Nach dem Google-Urteil des EuGH: Analyse und Folgen für das Datenschutzrecht, K & R 2014, S. 566 ff.
76. *Roßnagel, Alexander*,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zwischen Eigenverantwortung, gesellschaftlicher Selbstregulierung und staatlicher Regulierung, in: *Bieber, Christoph/Eifert, Martin/Groß, Thomas/Lamla, Jörn* (Hg.), Soziale Netze in der digitalen Welt, 2009, S. 269ff.
77. *Ruffert, Matthias*, Vorrang der Verfassung und Eigenständigkeit des Privatrechts, 2001.
78. *Ruffert, Matthias*, Di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zum Privatrecht, JZ 2009, S. 389ff.
79. *Ruttig, Markus*, Damit das Internet vergisst – Online-Archive und das Recht verurteilter Straftäter auf Beseitigung ihrer Namensnennungen jedenfalls nach Verbüßung der Strafe, AfP 2013, S. 372ff.
80. *Schaar, Peter*, Das Ende der Privatsphäre – Der Weg in die Überwachungsgesellschaft, 2009.
81. *Schenke, Wolf-Rüdiger*, Verfassung und Zeit - von der „entzeiteten“ zur zeitgeprägten Verfassung, AöR 103 (1978), S. 566ff.
82. *Schenke, Wolf-Rüdiger*, Verfassungskonformität der Volkszählung, NJW 1987, S.

2777ff.

83. *Schliesky, Utz/Hoffmann, Christian/Luch, Anika D./Schulz, Sönke E./Borchers, Kim Corinna*, Schutzpflichten und Drittwirkung im Internet – Das Grundgese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4.
84. *Schneider, Jens-Peter*,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s Europäischen Datenverkehrs- und Datenschutzrechts, DV 44 (2011), S. 499ff.
85. *Schneider, Jochen*, Hemmnis für einen modernen Datenschutz Das Verbotprinzip, AnwBl 2011, S. 233ff.
86. *Schneider, Jochen/Härtig, Niko*, Wird der Datenschutz nun endlich internettauglich - Warum der Entwurf einer 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enttäuscht, ZD 2012, S. 199ff.
87. *Schulz, Sönke E.*, Wider die Aufnahme des Datenschutzes in das Grundgesetz, ZG 2010, S. 358ff.
88. *Schwabenbauer, Thomas*, Kommunikationsschutz durch Art. 10 GG im digitalen Zeitalter, AöR 137 (2012), S. 1ff.
89. *Seidel, Ulrich*, Das Grundrecht auf Datensouveränität, ZG 2014, S. 153ff.
90. *Spiecker gen. Döhmman, Indra/Eisenbarth, Markus*, Kommt das „Volkszählungsurteil“ nun durch den EuGH, JZ 2011, S. 169ff.
91. *Spiecker gen. Döhmman, Indra*, Kommunikation als Herausforderung Neue Wege für Datenschutz, AnwBl 2011, S. 256ff.
92. *Spiecker gen. Döhmman, Indra*, Steuerung im Datenschutzrecht – Ein Recht auf Vergessen wider Vollzugsdefizite und Typisierung, KritV 2014, S. 28ff.
93. *Spiecker gen. Döhmman, Indra*, Zur Architektonik des europäischen und deutschen Datenschutzes im Zeitalter von Vorratsdatenspeicherung, Big Data und IT-Ehhancement im Lichte der Google-Spain-Entscheidung des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s, in: *Cornils, Matthias/Spiecker gen. Döhmman, Indra/M. Schwartz, Paul/Philipp Albrecht, Jan/Weichert, Thilo* (Hg.), Datenschu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5, S. 61ff.
94. *Spindler, Gerald*, Durchbruch für ein Recht auf Vergessen(werden) – Die Entscheidung des EuGH in Sachen Google Spain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as

- Datenschutz- und Zivilrecht, JZ 2014, S. 981ff.
95. *Trute, Hans-Heinrich*, in: *Roßnagel, Alexander* (Hg.), Handbuch Datenschutzrecht, 2003.
96. *von Lewinski, Kai*, Geschichte des Datenschutzrechts von 1600 bis 1977, in: *Arndt, Felix/Betz, Nicole/Farahat, Anuscheh/Goldmann, Matthias/Huber, Matthias/Keil, Rainer/Schaefer, Jan/Smrkolj, Maja/Sukker, Franziska/Valta, Stefanie* (Hg.), 48 AssÖR - Freiheit - Sicherheit - Öffentlichkeit, 2009, S. 196ff.
97. *von Lewinski, Kai*, Staat als Zensurhelfer – Staatliche Flankierung der Löschpflichten Privater nach dem Google-Urteil des EuGH, AfP 2015, S. 1ff.
98. *Waechter, Kay*, Prävention durch Pranger - die Rückkehr der Stigmata - Auch zum dogmatischen Status d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VerwArch 2001, S. 368ff.
99. *Weichert, Thilo*, Privatheit und Datenschutz im Konflikt zwischen USA und Europa, RDV 2012, S. 113ff.
100. *Weichert, Thilo*, Big Data, Gesundheit und der Datenschutz, DuD 2014, S. 831ff.
101. *Weichert, Thilo*, Zur Kontrolle von Datenerhebung und -nutzung durch global agierende soziale Netzwerke und sonstige Internet-Unternehmen, in: *Cornils, Matthias/Spiecker gen. Döhmann, Indra/M. Schwartz, Paul/Philipp Albrecht, Jan/Weichert, Thilo* (Hg.), Datenschutz im digitalen Zeitalter, 2015, S. 151ff.
102. *Wittinger, Michaela*, Der Schutz persönlicher Daten, in: Festschrift für Rudolf Wendt zum 70. Geburtstag, 2015, S. 493ff.
103. *Ziebarth, Wolfgang*, Google als Geheimnishüter, ZD 2014, S. 394ff.

Remember, Forget or Be Forgotten on the Internet: Review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gard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Chih-Wei Chang^{*}

Abstract

In May 2014,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JEU”) issued a landmark judgment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on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so long as the data subject has the right to request to remove his/her person data under the data protection laws, Google—the search engine company—is obliged to remove the links containing personal data from the search result list. The ruling has been dubbe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by many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news report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and analyze the landmark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

Dr. iur., Munich University, German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CTBC Financial Management College.

Received: August 17, 2015; accepted: May 25, 2016

aforementioned. The basis of the “right to have specific search results not be display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gnized by the judgment is also discussed in detail. After laying out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judgment,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and t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balancing test from Taiwan’s Constitution and German Basic Law are further explored in this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is discussed. The final part of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court ruling regard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For the conclusion and outlook, this article—having examined the court ruling—makes reference to the reasoning of the European court and explores the possible way to inherit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from the CJEU.

Keywords: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Moral Rights, Data Protection